SAIAS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闻道

2017年第3期　总第21期

· 王铁军老师访谈录：让理解力超越“眼见为实”
· 陈健怡：美国茶党议员移民政策立场的成因分析
· 李　括：《君主论》中权力关系思想的再认识
· 黄世成：回乡随笔——大陆与我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冯钰雷

沟通的渠道

交流的平台

启发智慧，

碰撞思想，

分享知识，

奉献感悟。

严肃和活泼

夏真真

“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这八字标语是1939年毛泽东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题写的校训，我上小学的时候，校门上也镌刻着这几个大字。那时常犯嘀咕：“严肃和活泼，不是一对反义词吗，放在一起不是矛盾吗？”而今时移世易，对其初衷不作深究，却是感慨当下：与人的品质而言，“严肃 活泼”须是同时具备的“一体两面”。

“严肃”应当是对工作目标和态度的要求，“活泼”应是保持思想自由和活跃的状态。“严肃”的追求和态度之下，往往跟随的是认真谨慎和精益求精，对抗的是漫不经心和得过且过；“活泼”思想所凸显的是动态发散和新鲜感知，也会经常有股子另辟蹊径、批旧立新的冲劲。

有时，它们也像风筝和线的牵扯，风筝高翔天际，能够居高纳广，有一线牵系，既是约束又是助力。

两者共存，相益相补。在治学，可以是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在做事，可以是遵程守序和灵活变通；在为人，可以是草莽精神和“不饶点滴，不饶自己”的力求精确。一如1983年黄永玉写给曹禺的信中，谈及文学创作，既需要“灵通宝玉”的启发和指引，突破藩篱以立新意，又需要缜密的命题和演绎技巧来表现，以贴近透彻本意。

青年时期，气质脾性里大抵还是严肃不足、活泼有余的。有人说，青春不是一段时期，而是一种状态，一种对世界保持探索欲和新感知的鲜活之气；胡适说：“知识就像眼镜，受过教育获取了知识的人，就好比一个近视的人戴上了眼镜，从此能够看清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能够看到人家看不到的东西。”我们去游学、旅行、读书，同陌生的当地人交谈、了解当地社会人文，探索欲和感知力让我们得以体会更丰富的情感；而那些规律性的学术积累让我们得以看到更大的格局和更远的因果发展可能。

闻道

2017 年第 3 期
总第 21 期

主　编：
陈子越

本期执行主编：
夏真真

副主编：
张　莹　刘一鸣　孙　莹

编　辑：
（按拼音字母排序）
陈　征　康　恺　连鹏飞
陆依宁　沈钦韩　岳叶帆
张　颂　赵中野　周婷婷

封面题字：
冯绍雷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闻道》编辑部
主办

目 录

卷首语

严肃和活泼
…… 夏真真

学人访谈

王铁军访谈录：让理解力超越“眼见为实”
…… （01）

美国探闻

新闻报道中的中美身份建构——以《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有关习近平访美相关报道为例
…… 王晓璇（11）
美国茶党议员移民政策立场的成因分析
…… 陈健怡（22）

政治求索

《君主论》中权力关系思想的再认识
…… 李　括（44）
我与亚里士多德的一次“邂逅”——从“政治”即追求至高的善到公民个人幸福观的实现
…… 王弘毅（54）

百花齐放

新疆纪行
…… 赵舒婷（57）

花莲小记
……姚森元（65）
回乡随笔—大陆与我
……黄世成（70）
罗西亚先生其人
……辛比尔斯科（73）
“你丑你先睡，我美我直播”：直播现象及其象征的国内主流文化发展趋势
……【澳】高林（75）
科技革新与国际体系的转型
…… 申 韬（78）
国关要闻
……（81）

《闻道》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闻道》（季刊）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刊。该刊由华东师大国关院主管，是学生自主管理、自主发行的一份学术思想人文刊物。《闻道》编辑部成立于 2010 年 12 月，2011 年 3 月发行第 1 期。

本刊坚持“ 以学术为主，不惟学术，百花齐放 ”的办刊理念，力图为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面的研究生提供一个学术习练的舞台。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 座 414 室

邮编：200062
邮箱：wendao_ecnu@sina.com
网站：http://www.saias.ecnu.edu.cn/il265.htm

注：未获本刊事先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本刊内容

学人访谈

王铁军访谈录：让理解力超越“眼见为实”

学人小传

王铁军，法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1 年获博士学位，于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毕业，2009 年调入华东师范大学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新葛兰西主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等。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全球治理机构与跨国公民社会》、《葛兰西思想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及华东师大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项目《中俄油气合作》。主要学术研究成果包括《新葛兰西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全球治理、WTO 和跨国公民社会》、《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欧盟工会与欧盟治理——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角的考察》、《角逐“近外国家”：批判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欧俄关系》、《体系认知、政府权力与中俄能源合作——来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等。近年来出版专著《全球治理机构与跨国公民社会》、《全球生产网络与东盟一体化》。

《闻道》：非常感谢王老师接受《闻道》采访。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新葛兰西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王：传统国关理论强调 power，即物质力量之间的对比，是硬实力。但理解国际关系仅仅考量物质力量是不够的。毛主席曾说过“人定胜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思想、观念因素相对于物质力量的能动作用。物质力量很重要，但思想观念因素更能体现行为主体的意志，能够将无意识的物质力量转化为各种可以理解的有意义的行为。总有人愿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甚至抛头颅洒热血，硬实力很难规定一切。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两国国力相差甚远，我们的先烈因于民族精神的指引，用生命铸造民族生存的根基，便是一场信念与物质力量的角逐。近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提倡“软实力”，日渐强调文化观念的作用，在这方面，新葛兰西主义是重要的学术源头之一。

新葛兰西主义认为文化霸权不是强制而是说服，是“被统治者接受了统治者的价值观念和主张，认为统治者是对的”，这很有意思。比如，福特主义强调阶级调和，认为对资本家好的对工人也好——只有资本家的产品售出获利，工人劳动才能换得报酬。因此，工人与资本家要相互配合、相互支持。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思想发自内心的认同，就是葛兰西主义所指的“文化霸权（领导权）”。二十世纪的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文化霸权的存在：殖民地的青年接受西方教育后，回国领导本国民族解放与独立战争，最后仍依照西方的理论建设国家，这涉及文化领导权——边缘的、弱势的、被统治的群体主动接受强势文化。文化权力的影响和被影响、作用和反作用机理值得关注。

除葛兰西外，卢卡奇、萨特、雷蒙德·威廉斯等很多西方学者也对文化权力的影响有所关注，包括后来的福柯——他认为社会是一张权力互相影响的网，每一个人、每一个层次都是权力主体。这种观点强调思想和文化的作用，颠覆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权力固化的定义。有人说当前的国际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权力。话语本身确实是一种权力，能否提出自己的话语很关键。以前西方人讲东方人不了解自己，不能呈现自己，因而需要由西方来讲东方的故事，这种观点来源于萨伊德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些思想一脉相承，都是研究作为一种权力的话语、观念如何运作和展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我认为葛兰西主义在拓展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方面很有研究价值。

《闻道》：您认为葛兰西主义对当代中国有什么现实意义？

王：准确地说，我是在山东大学读博士期间开始关注新葛兰西主义的。我所在的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之前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学院。学院的学科带头人都是做科社研究的，像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是学英美史出身，到了山大总归要同社会主义研究基地的主流相协调。硕士期间，我开始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二时我已读完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并且读过不止五遍。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求学时，我在时殷弘老师讲授的国际关系理论课上听到了肯尼斯·沃尔斯的名头，并通过他了解到罗伯特·考克斯。有这样的知识储备，在山东大学读博期间，我就尝试将考克斯的跨国历史唯物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山大的科社共运研究相联系、相贯通。

葛兰西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极为深厚，现在，葛兰西主义的很多思想渐被我国学者所重视。比如葛兰西主义所说的“历史集团”与我们所提的“统一战线”十分相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意在将阶级斗争搁置起来，团结各方，共同作战，这也是历史集团的题中之义。同样，爱国统一战线也是如此。与“历史集团”相似，“统一战线”并不是通过强制建立起来的，而是得到了所有参与者的充分认同和支持，它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其领导核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得到了全民族、全社会的认同，不再局限于无产阶级。这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乃至今天的改革开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国两制”就是爱国统一战线的一种体现，并且超越了阶级性。

再比如葛兰西主义中的“消极革命”。很多国家没有力量从内部发起革命，“消极革命”所指的借助力量便是外部输入性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党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这一历史时期的重大战略认识和决定要求实行改革开放，通俗地说，就是“补资本主义的课”，借助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但在当时，经历大跃进、文革之后的中国社会几乎没有资本主义要素，要“补资本主义的课”意味着一定程度上亟需扶植资本主义要素以促进生产力发展。那么，资本主义要素从何而来？开放的目的就在于引进外资，将外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要素引进国内。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说符合葛兰西“消极革命”的定义。中国意识到“斯大林模式”行不通，必须开辟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方法就

是在本国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下借助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要素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一直以来，中国学界主要关心大国关系，大国崛起，反观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其领域更为广泛，还将全球社会运动、跨国公民社会、跨国非政府组织等跨国关系纳入了研究视野。

在西方，大赦国际、红十字会、绿色和平组织、“占领华尔街”、茶党等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如火如荼，如气候变暖、动物权利、濒危物种、转基因工程、劳工权利和妇女权利等议题大都着眼全球范围。在中国，上述问题仍处于国际关系研究的边缘。我国长久以来坚持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在涉及全球治理问题上还未形成明确思路。然而，事实上，由于中国当前的国家体量和影响力，时代正在迫使我们转变思想，开辟新的国际关系思路。“一带一路”就是很好的例子。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和深入实施，中国的投资势必改变当地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周边地缘政治关系，这是无法回避的。

今天，中国的经济体量居世界第二，这意味着中国越来越不可能再沿西方的道路亦步亦趋，因而必须要有自己的创新思维。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追赶西方，但现在不同了，中国必须拿出新东西来，走在世界前列，引领世界发展。不是再追赶，而是要超越乃至引领了。身前没有效仿对象，道路该怎么走，是中国目前亟待思考的问题。当前时期，中国需由“消极革命”转向“积极革命”，主动形成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大趋势。这可以说是葛兰西主义对中国当前重要的启发。

《闻道》：您时常强调“结合现实问题的研究更有意义”，您目前在关注哪些具体的现实问题？

王：我目前十分关注理念文化的作用。当前学界主流是成立智库为政府出谋划策，这很有必要。那么学者提出的建议如何才能更合理、更契合现实？一般来说，学者可接触到的具体事物并不多，在这方面绝对没有政府官员掌握的资料和经验丰富。学者的优势在于理论底色的支撑，能够看得更远、更广，抓住并依据长期不变的东西确定位置，因而不至于迷失在大量的表面现象中。一些哲学思想是学者必须深刻认识的。当前，我发现许多学者常使自身受限于种种现实问题，对于深层次、理论性、久远的东西渐渐忽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是新闻记者的深度，不是学者应该止步的地

方。所以，我更关注更深层次的观念与文化。

中国发展太快，社会浮躁风气日盛，短期可得的物质利益上升为许多人的第一考量。你们这一代学生，应该与这样的风气保持一定距离。你们的时代不同于我们的时代，不能再被喧嚣的现实牵着鼻子走。我的老师那一代人，经历过生活的穷匮贫乏，对物质的渴求可以理解。你们这一代生活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年代，有条件不为物质所囿，可以用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思考那些与吃饭无关的问题。

我们这一代学者与上一代学者、再上一代学者相互之间存在代际断裂。像我的研究生导师钱乘旦，是学界英国史权威，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博士；而他的老师那一辈人，如蒋孟引、王绳祖老先生，是国内相关学科的开拓者，是民国时期的留洋博士。

《闻道》：您所谈到的中国学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产生这种代际的原因是什么？是所处时代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研究方向和学术追求？

王：可以这样说。中国现代史跌宕起伏变化频仍。就我们国际关系学科而言，以国际关系史的开拓者南京大学的王绳祖老先生而言，其同代学者很多是留洋博士。其学生一辈如时殷弘老师那一代人是共和国培养的第一批博士，经历了文革，其学术成果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取得的。而在他们的后辈学生中，由于时代条件所限，很多人没有学过外语，尤其是文革期间的学者，很少接触国外的学术著作和信息。我这代人成长于改革开放时

期，对国外的学科发展状况有更多的接触和交流，但也面临问题：首先，西方传入的国关思想理论虽多，但不成体系。直到今天，黑格尔的著作也没有完整翻译过来，只有支离破碎的部分中译本。除了技术上引进翻译的学术作品不完整，政治考虑和意识形态因素也是重要原因。对学术作品的部分选择吸收往往产生误解，这是我这代学者面临的一大困难。你们这一代仍要受到这些影响，即在自身尚未完全理解掌握西方既存学术的情况下，时代就迫切地提出了创新的任务。当今的情况是，经济物质力量发达、学术思想研究不足以满足发展的要求。因此，我们要花更大的气力去研究全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首先要分清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

《闻道》:在您之后的职业经历中“投新闻从学术”的转变是出于什么原因？

王：记者的主要任务是如实地反映事实本身，其工作是一种写实活动。记者选用文字、音频、视频的组合拼接进行现实的再现，要求用事实说话。记者主要关注事实，而学者不仅要关注事实，更重要的是解释事实背后的缘起和发展逻辑。在某种程度上说，记者是一种“媒介”，他们依靠“直觉”“新闻敏感”来选择、反映现实，是世界面貌和境况的“展示窗”。我可以到第一现场报道，亲自接触、体验世界的“真实”，观众通过我的表达形成对世界的构想和理解。但记者不应该向受众强行灌输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不太符合我“多事儿”的性格，我总是不满足于“是什么”，喜欢追究“为什么”。另外，新闻时效性强，记者的工作成果时效性太短，易被遗忘。有时我想不如写几本书，不管有没有人看，至少成果还在。

但是，新闻乃至文学作品由于其“写实性”，常常为国际关系研究带来良好的素材。有很多文学作品创设于国际关系背景之下，比如《战争与和平》就是取自拿破仑时期法国与俄罗斯之间侵略与反抗的历史性题材，它以作家的直觉、现场的观察和思考呈现国际政治的变换，甚至比所谓的“国际关系理论”更加深刻、更接近真相。文学完全可以通过想象、虚构呈现国际政治，其叙事有现实的依据。一个阿 Q 可以代表中国特定时代大多数农民的气质。文学作品完全可以以另一种形式，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描述国际关系。很多国际关系学者也写小说。最近，我读到西方的一些论文讨论《指环王》中的国际关系、《哈利·波特》中的社会关系，这些都是

从另一种角度展现国关的研究对象。不同的人可以研究同一种对象，不同的研究方法呈现出不同的成果，都是对精神生活和知识世界的贡献。

《闻道》：您觉得记者除了呈现事实，是否可以作出评价？

王:记者有时也会作出解释与评价，但这常常基于直觉和观察，当然也不排除简单的推理。记者和历史学家的任务非常相似，都是以事实作为工作或研究的对象。记者需要呈现事实本身，历史学家需要还原历史的本身和真相。但事实证明这不可能实现，任何文字表述都会打上观察者的烙印。记者对报道对象进行选择，对呈现内容进行选拼，出于人为意志内因素或能力范围制约，观众常看到事实的部分内容，甚至颠倒的因果链条。这样算不算歪曲事实？我们的文字和答案总带有主观色彩，就连相片都带有主观色彩。历史学家说“历史就是活人向死人的对话”，记者也是如此，不断地对事实进行发问，但这个过程的主观色彩难以避免。

对事实发问，如何才能提出好问题，需要理论素养的支撑。记者用眼睛看世界，但很多东西仅用眼睛是看不到的。眼睛至今看到的也是太阳围着地球转。这就需要以理论作支撑，透过现象发现本质。尤其是仅通过观念表述的事物，更需要借助理论工具加以理解。理论是另一双眼睛，是显微镜和望远镜，让人类的理解力超越“眼见为实”。

《闻道》:新闻学和历史学的专业背景对您从事国关研究有什么影响和帮助？

王：国际关系研究什么是需要明确的首要问题。国关研究涉及领域广泛，既包含国关理论，又包含国关事件。如果研究国关事件，研究对像就是一个个具体的、历史的、真实的现象或客体，历史和新闻背景就非常有帮助。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说，历史和普通人所理解的不同。历史不仅仅研究事件、现象如何变化，历史学家还需要关注不变的东西。总着眼于瞬息万变的新闻时事或者历史现象的表层变迁，就容易迷失，失去对事态发展大趋势的把握，发现存在于时事现象背后有法可寻的规律才是最终追求。所以年鉴学派希望发现反复发生的事件，寻找长时段的规律。比如说，年鉴学派把历史按照地理时间和事件时间进行划分。从地理时间来看，它可能保持几千年不变，塑造影响着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国际关系也讲地缘政治、地理因素。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

维研究空间、时间与人的国际关系史。人类历史及其所有生产活动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是在一定的空间时间中发生的。时空与存在于时空中的人及其活动相互交流、相互改造。时空把本身的特征性质内化于人的生产实践活动。这些年，就我自身来说，周围的生活空间变化很大。我曾辗转生活工作在大城市、郊区、工厂和学校，出国访学也使我对空间的感受更加深刻。如果不了解西方地理，就难以理解西方国家体系；如果不了解中国地理，也难以理解中国大一统问题。

《闻道》:早年到加拿大约克大学 Robarts 加拿大中心和美国伊利诺伊香槟分校东亚和太平洋研究中心的出国访学经历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对您的学术研究有怎样的影响？

王：博士毕业那年得到去约克大学访学的机会。申请去约克大学是因为罗伯特·考克斯，遗憾的是当年老先生正好退休。考克斯的一名得意门生史蒂芬·吉尔继承了他的衣钵。吉尔主要研究新葛兰西主义，并在约克大学开设“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程。约克大学和周边几所大学，如多伦多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互有学术上的交流联系。新葛兰西主义学派的学者们大都集中在那里，学校中的学科带头人都是新葛兰西主义学派中的杰出人物。新葛兰西主义的另一派学者集中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形成以范德·佩吉尔为代表的阿姆斯特丹学派。这些学者以阿姆斯特丹大学为中心，学术影响辐射至英国、北欧等诸多国家。马克思提出资本有机构成的意义不同，他们便以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为基础进行拓展研究和深度挖掘，强调辨析不同资本的有机构成。比如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互有利益和矛盾，房地产和制造业互有利益和矛盾。任正非看到房价上涨后，将公司总部迁离深圳，落址东莞。这反映出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运动。

我到约克大学访学的目的是研究学习考克斯一支的新葛兰西主义学派。考克斯的新葛兰西主义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我在约克大学主要研究全球治理，属于全球层面，而非国家或者生产层面。考克斯构想的结构顶层是国际关系，中间是国家间政治，底层是生产关系。这个生产关系是指企业内部管理，属商学院的研究领域。一定程度上说，全球治理是一个涉及广泛的有机整体领域，它至少囊括三个学科：国际关系、国际商学、政治社会学。我的设想是将全球治理与时空的地理理论相

结合，将考克斯的理论框架呈现于真实具体的时空中，下一步希望以此视角考察中国。毕竟研究考克斯的理论能给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发展带来哪些有价值的启发，中国的具体实践又能如何反作用于考克斯理论框架的发展和修正，具有重大价值。

《闻道》：最后请王老师送一句寄语给《闻道》吧。

王：愿《闻道》能够上下求索，求真务实，积极发挥好促进同学们思想交流的作用。

（采访：刘一鸣、夏真真、张良、周婷婷、岳叶帆、康恺、连鹏飞）

（编辑：周婷婷、岳叶帆、康恺、连鹏飞　责任编辑：夏真真）

美国探闻

【编者按】美国的政治社会变迁常被视为可资借鉴的国家制度创制的源泉。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中说：“没有比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政府更令人难以抗拒的了”，而要保证施令的权威、广泛、持续，重视民众对政府政策的参与和反响必不可少。2009 年以来，从游行示威到竞选总统，美国社会兴起的保守民粹主义茶党运动已渐成一股代表民意的强大政治力量；在国家对外交往中，社会民众的“他者”认知也强烈影响着国家间关系的建构。

新闻报道中的中美身份建构

——以《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有关习近平访美相关报道为例

王晓璇*

【摘 要】：任何新闻、任何新闻媒体在针对某一特定事件进行报道时均存在报道框架。① 报道框架使得不同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内容存在偏向。因此，采用不同报道框架导致报道内容各有不同，直接影响该媒介受众对新闻事件的看法。《人民日报》作为中国最权威的官方媒体，是官方话语的传声筒，其报道可以作为官方看法的代表。《纽约时报》作为美国影响最大的报纸，有“档案记录报”的美称，是美国高级报纸、严肃刊物的代表，长期以来拥有良好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其次，二者都属于综合性日报。面对同一政治事件，有较强的可比性和研究意义。本文以新闻报道框架作为分析工具，主要以《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有关 2015 年 9 月习近平访美事件的报道为例，考察新闻报道如何体现中美两国身份建构的路径走向。

【关键词】：媒体；报道框架；建构主义；习近平；访美

一、《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的报道框架

2015 年 9 月 22 日至 25 日，应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针对该事件均进行了一定篇幅的报道。本节将从报道主题、报道内容、报道领域与该议题相关报道数量进行梳理，并对其报道框架进行概述。由于习近平访美日期集中在 22 日至 25 日之间，因此，新闻报道样本选取在

* 王晓璇，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6 级硕士研究生。

① 新闻框架理论：由戈夫曼提出并兴盛于 20 世纪 80 年代，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对于新闻报道的选择并不是毫无章法的，而是通过固定的框架选择报道对象、消息来源、报道角度等，为受众提供他们的认知“套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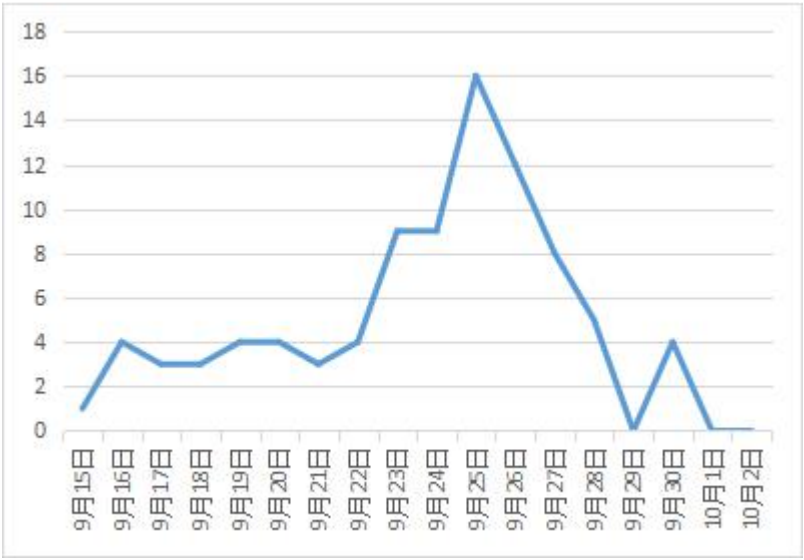
议题相关报道较集中的前一周和后一周之间，也就是 9 月 15 日至 10 月 2 日的报道内容。

（一）《人民日报》报道内容

笔者对《人民日报》9 月 15 日至 10 月 2 日所有版面的新闻进行统计。将新闻内容中含有“习近平访美”关键词的评论、通讯、消息进行全部提取，并从报道数量、内容、关键词、版面分布这几方面进行梳理。

1. 数量

下图为 9 月 15 日至 10 月 2 日《人民日报》有关“习近平访美”文章总数量与日期关系折线图（见图一）：



图一

习近平访美前一周至访美结束后一周这一时间段中，出现“习近平访美”这一关键词的文章共有 95 篇，平均每天 5.3 篇。其中，9 月 25 日到达与议题相关文章数量峰值，多达 16 篇。其中包含 7 篇消息、3 篇通讯以及 1 份名为《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的演讲全记录。随着习近平行程转向 9 月 26 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报纸主要议程也随之改变，有关访美议题的文章在 26 日以后急剧下降，后期基本为零。有着议程前奏长但是对于议程的成果评论少的特点。

2. 内容

根据不同报道主题，并结合习近平访美具体议程大量涉及到的问题，笔者将案例涉及主题词分为六类：大国政治、经济贸易、历史文化及文化交流、社会反响、网络安全、气候环境。本次议题中，《人民日报》刊载了有关专家学者的大量采访、评论文章，以及来自美国本土的声音，因此单独列出包括专家学者见解看法、民间声音、地方反响在内的社会反响门类。由于网络安全与气候环境是本次习近平访美的重要议题，因此将其单列出来进行具体议题主题词内容对比。不同类别主题词列举如下：

类别	主题词
大国政治	新型大国关系；管控分歧；政治互信；合作共赢；和平崛起；战略互信；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合作
经济合作	经贸合作；经济交流；合作共赢；利益交点
历史文化与文化交流	历史经验；二战合作经历；民间交流；了解与互信
社会反响	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交流互信；合作共赢；前景光明
网络安全	网络；全球治理；积极参与
气候环境	承担责任；协商；合作；交流互信

（表一）

3. 版面分布

根据人民日报一般排版规律：1 至 5 版是要闻版，后面续接评论、国际、文化、副刊等内容。因此，将第一版称为头版，将虽然刊登要闻但非头版的版面称之为次版，其余非要闻版称之为其他版面。其中，头版报道分为头版非头条与头版头条两种。在这种分类下，统计结果可见下表：

报道占版面位置	总量	头版非头条	头版头条	次版	其他版
数量	95	16	5	50	24
所占百分比（%）	100	16.8	5.3	52.6	2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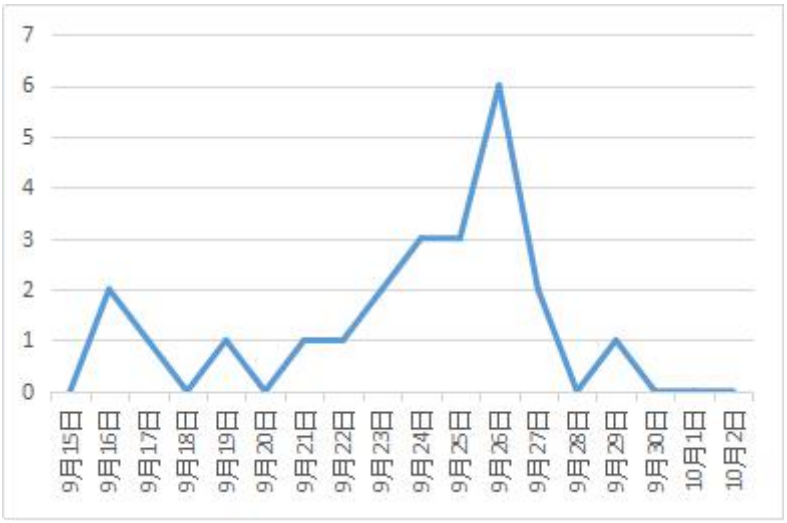
（表二）

（二）《纽约时报》报道内容

同理，笔者对《纽约时报》9 月 15 日至 10 月 2 日所有版面的文章进行统计。将新闻内容中含有“习近平访美”这一关键词的评论、通讯、消息全部进行提取，并从报道数量、内容、关键词、版面分布这几方面进行梳理。

1. 数量

《纽约时报》对于习近平访美议程的报道数量明显少于《人民日报》，共 23 篇，平均每天 1.3 篇。下图反映了日期与报道数量的变化（见图二）。



（图二）

报道数量的峰值出现在 9 月 26 日，共 6 篇。这六篇文章中，消息四篇，评论文章两篇。整个议程有重点明确、行程类报道少、后期评论多的特点。

2. 内容

对于该议程的几大主题的关键词，《纽约时报》与《人民日报》展现了自己不同的风采，表三列举了《纽约时报》上的不同主题的关键词。

类别	主题词
大国政治	promise challenge ambition action disappointing rein
经济合作	doubt complaint slowdown action skeptical
历史文化与文化交流	
社会反响	Falun Gong
网络安全	progress action unclear lying
气候环境	emission action

（表三）

在该时间段中，除了一篇与习近平访美并无关系的介绍中国饮食的文章出现在《纽约时报》上，其余版面均未出现有关“历史文化与文化交流”的报道或文章。因此，上表中该栏为空白。通过上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纽约时报》对中国反复强调的友好信号持疑，美国社会更加注重行动的力量，认为没有具体行动之前一切都是不清楚的。[①]尤其是在“网络安全”与“气候环境”这两个具体问题上，《纽约时报》花大量笔墨进行相关报道，并且表示：美国社会看到了双方领导的努力，但是进一步的行动更为重要。[②]在《纽约时报》上有关“习近平访美”的报道中，南海问题、经济下行、网络安全、环境问题是各类报道涉及的主要议题。还需单独提出的一点是，在 9 月 28 日当天的《纽约时报》A9 版上，赫然登着一份名为“致中国政府的一封信”的广告，广告出资者为法轮功集团，虽然这封公开信是以广告身份刊登在报纸上的，但是其排版、字体等均与“纽约时报”几个字相差无几，在报纸左上角小小的“advertisement”一词几乎可以忽略。这样的广告极易被读者误解成正文，文中还反复提到“法轮功”在中国是敏感词汇。虽然广告刊登自由，但是在习近平访美期间刊登如此敏感并且以假乱真的广告，其目的不得不让人打上一个问号。

① “Finding Common Ground with China”，*New York Times*, 2015.09.26(A26).

② J. Perlez and N. Wingfield:“ Chinese Leader Hears Tough Complaints of American Business”, *New York Times*, 2015.09.24(A21).

3. 版面分布

对于《纽约时报》来说，A1 版为头版，其他标号为 A 的版面刊登国内国际事件的相关报道，因此称之为次版，标号为 B 的版面则是以商业、科技、体育、时尚等为主题的版面，因此称之为其他版面。根据上述版面分配规律，统计结果见下表：

报道占版面位置	总量	头版非头条	头版头条	次版	其他版
数量	23	2	0	20	1
所占百分比（%）	100	8.7	0	87.0	4.3

（表四）

从表四中我们可以看出：23 篇报道中没有一篇出现在头版头条，仅有 2 篇报道出现在头版——其中一篇也只是报道标题出现在头版，正文位于 A11 版。其余的报道分别在 A4、A7、A8、A9、A11、A12、A21 等版面上，可以看出关于“习近平访美”的报道在《纽约时报》上并不十分突出。从所占版面篇幅来看，23 日的 A11 版、25 日的 A12 版、26 日的 A9 版报道的篇幅占了将近一个版面，这说明《纽约时报》对“习近平访美”还是给出了大量的报道的。因此，综合《纽约时报》报道的版面位置和篇幅来看，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纽约时报》针对“习近平访美”有一定量的内容报道，但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报道并未出现在报纸的显著位置（即次版和其他版面）。这样的版面分布结果原因有二，第一，与“习近平访美”日程几乎同步的“教皇访美”事件在美国更具有“首要性”；第二，《人民日报》报道访美新闻有向本国国民宣传本国国际影响力的任务，可是有关中国的对于美国国民来说关注度并不高，《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只需将议程的主要议题报道出来即可。

（二）《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报道框架对比

美国学者盖姆森指出：“框架是一组具有组织性的中心思想，不但能让相关事件产生某种意义，还能建议什么才是主要的议题。”媒介框架是

一种建构过程，由“诠释包裹”与“框架装置”组成。[①]“诠释包裹”即新闻故事中的主框架或故事线，从不同的角度诊释，新闻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框架装置”则起到衬托及强化诠释框架的作用，通过各种图形、符号、颜色或标语等来凸显议题。

通过上面两节的梳理，面对“习近平访美”这一议题，两报明显有不同的报道框架，即报道主框架与故事线不同。甚至面对同一事实，两报由于摘取事实段不同，导致报道侧重点与文章态度也有不同。下文将对两报的报道框架中“诠释包裹”部分进行对比，并摘取具体事实作例。

两份报纸在议题显著性方面相似性很高，均对于经济贸易、南海问题、气候变化、网络安全这几个主要议题给予了重点关注。但是相近议题下，两份报纸使用的主要报道框架却不尽相同。《人民日报》主要使用政治宣传主导框架，95 篇报道全部用于宣传中国政府对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以及树立中国大国形象。而《纽约时报》整体上则使用怀疑框架，大量报道用于质疑中国是否会有进一步行动印证自己的友好表态。

从具体议题角度看：

在大国关系方面的报道中，《人民日报》积极使用合作框架、互利共赢框架和战略互信框架。报纸在相关报道中大量截取中美领导人于框架有关的发言、引用中美学者与框架有关的言论、并辅之以积极的社会反响衬托中国的友好、可信赖形象。《纽约时报》则采用质疑框架（skeptical），其相关报道的主要态度相对《人民日报》较消极，对于习近平的主要日程给予很小篇幅的报道，对中国领导人的实际行动与两国交往实际进展更感兴趣，并在此基础上反复表示行动见真知（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人民日报》反复提及的二战时期中美合作史实并没有在《纽约时报》上被提及，《纽约时报》反而将习近平政府与胡锦涛、邓小平政府进行比较，认为习近平政府更为强硬，也更为口是心非。

在经济贸易方面的报道中，《人民日报》采用经济积极发展框架和合作共赢框架。报道中主要通过习近平的发言反复强调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并且短时间内经济不会衰退，不断暗示政府会通过政策调整经济，现在国内出现的经济发展放缓仅仅是发展过程中的缓冲期而非经济衰退。《纽约时报》虽然与中美经贸相关的报道数量不多，但是仍能明显看出报道使用了衰退框架。认为习近平只是打强心针，国内经济状况并不乐观。报道中

① 谢曦：“《人民日报》有关中印新闻的框架建构研究”，厦门大学，2008 年。

甚至直接用数据表明自己的态度——“ In 2010，58 percent of executives were optimistic about the business outlook in China， while 33 percent were somewhat optimistic，said John Frisbie，the council’s president. Now just 24 percent are optimistic while 67 percent are somewhat optimistic or neutral.”

在气候变化与网络安全这两个问题上与上述框架的使用大同小异。《人民日报》的报道仍旧在反复释放友好信号，使用合作框架。反观《纽约时报》，持续使用质疑框架，认为中国的话语终究只是听起来积极（sound encourage），实际行动尚未可知(not clear)。比如，《纽约时报》在 9 月 25 日一期的 A1 版上，一篇名为《U.S. Says China Will Announce Cap-and-Trade Emissions Plan》的报道直接表示：“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China will be able to enact and enforce a program that substantially limits emissions.”后又在 9 月 26 日 A9 版的一篇名为《U.S. and China Agree to Rein In State-Sponsored Computer Thefts》的报道中再三表示：“The question now is，‘Are words followed by actions?’ ”。

其次，两份报纸在有关于网络安全的具体范围上有认知差异。《人民日报》仅仅反复表示中国有意愿与美国一道进行网络安全治理，并会积极参与其中，有关认知差异未提及半句。但是《纽约时报》直接指出该认知差异：“Mr. Xi said nothing of computer-enabled spying， speaking only of ‘cybercrime’，a narrower formulation”。但是，《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均表示在气候、网络安全问题上两国合作十分重要，并且仍有很大合作空间，两国对气候和网络安全问题均有较大期待。

在南海问题上，两份报纸的表述比较一致。《人民时报》表示南海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涉及问题应该由邻国之间来解决，其他不涉及领土问题的国家不应该插手。《纽约时报》也表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明确表示南海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是《纽约时报》还在此基础上加上了一些其他理解，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是习近平政府真正态度的凸显，习近平政府并不像其反复强调的那样友好，反而验证了之前的质疑框架。

在中国国内反腐问题上，中媒外媒均持肯定态度，认为中国国内的反腐力度很大，并且凸显了中国政府的决心。

因此，《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由于“诠释包裹”方式不同，面对同一议题就会出现不同的新闻话语，即有不同的新闻框架。在长期的新闻媒介接触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文本性的态度”，即基于新闻文本

往往比诉诸于其所描述或报道的现实具有更大的权威性，人们倾向于拒绝与外在现实世界直接接触而去求助和信赖于新闻文本的权威。很明显，不同新闻框架直接影响新闻内容的选择，新闻内容影响受众对议程的认知。

由于中美两国新闻话语建构角度的不同，导致两国新闻媒体在面对同一议程时有不同观点。换句话说，从中美新闻中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在建构两国关系路径上有较大差异。

二、新闻报道与中国身份建构

（一）中国身份建构

温特 1999 年出版的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全面阐述了他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建构主义质疑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定，从社会互动角度提出了新的国际关系研究议程，创建了以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体系结构理论。①

建构主义主要包含三个要素：共有知识、实践、变化。其中，“共有知识”强调国际环境中国家与国家之间共享的观念、文化或者国家与国家之间共有的期望与理解；“实践”主要强调两国之间的互相交往与两国之间的观念存在互构关系。双方一经交往，初始实践造就初始观念，观念与后来的实践自觉不自觉相互印证，让两国共有理念成为交往框架；“变化”主要强调随着国际体系的变化，国家间也会出现新的理解与期望。也就是说，有新理念与实践的新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有机会改变旧的国家间的共享理念。

首先，从上文中《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对于习近平访美的新闻报道来看，中方的报道反复强调两国合作共赢是时代的召唤，并且在行文中反复强调“世界本无修昔底德陷阱”这一理念。除此之外《人民日报》花大量笔墨回忆并叙述了中美两国在二战时期合作抵抗法西斯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史实。从建构主义角度讲，中方是在试图建立两国的“共有知识”，即希望运用两国之间共享“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观念建立起两国外交的新局面。反观《纽约时报》，美方似乎有意跳过“修昔底德”这一词汇。在“习近平访美”这一议程相关的 23 篇报道中，“Thucydides's trap”

① 秦亚青：“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欧洲研究》，2001 年第 3 期，第 4-11 页。

这一关键词出现次数为零。报道中更注重诸如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具体议题的商讨进展。但是，美方却掩盖不住自己报道中表现出的对中国和善面孔下是否有更大野心的担忧。《纽约时报》中的一篇评论甚至直接表示“世界不是围绕中国转的，中国没有你们自己想象当中那么重要”。此类言论中不乏有希望打压中国势头的目的，这给中国敲响一个警钟：在国际言论中反复强调“修昔底德陷阱”是否也在无形中强化了自身的争霸国家形象。因此，中国试图建立“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这一两国之间“共有知识”的意图目前看来仍困难重重。在美方更注重实际行动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不仅需要不断通过语言概念来表达自己的合作意向，更要从实践上向美方灌输自己的共赢概念。

其次，从实践层面上来看。《人民日报》花费大量版面刊登通讯、评论文章来强调中美两国在二战期间的友好交往史实以及两国在过去交往中合作共赢的案例。与此同时，中方还积极报道两国对于“习近平访美”这一事件的社会反响：通过对西雅图等城市人民对于“习近平访美”积极态度的报道、中外学者对于两国合作重要性强调的报道、以及对诸如波音与中国合作等民间经济合作成功案例的报道。中方明显是希望通过实践反哺自己的理念架构，呼吁中美两国在未来进一步积极合作，争取共赢。从美方的报道来看，中方的这一策略虽然相对于只是反复口头强调概念的通讯文章来说更有效，但是反复强调二战史实对于美方来说并无吸引力。反观《纽约时报》，从习近平访美之前的相关报道来看，除了一些介绍中美两国实际情况背景的报道之外，大多数文章抱有的态度为“观望为主，一切待定”。但是随着习近平访美行程的深入，两国交流涉及到的问题越来越深入具体，美媒的态度明显温和许多——虽然针对不同问题有不同程度的质疑与批判，但美媒还是很乐于看到中美双方在不同领域上有新的进展。因此，中方通过实践反哺理念这一举动相比单纯话语表态、释放友好信号更能符合美媒的思维方式，也应该更有效果。

因此，从新闻报道框架上来看，中国试图建构自身友好形象，并且希望带着这种友好形象参与到国际事务中。与此同时，观念建构与实践相互影响，我们在不断通过媒介等工具强化观念的同时也应该利用实践的工具强化观念。但是，通过美媒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出，具体实践议题的反哺有效性是有很大差距的，比如：报道波音集团与中国经贸合作的反哺力度就远远大于反复报道中美在二战时期共同抗敌经历的反哺力度。因此，这就

涉及到在建构中国身份与中美两国关系时新闻的宣传策略。

（二）观念建构与新闻宣传

通过对《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的内容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国都认识到了合作的重要性。因此，以合作共赢作为两国共有知识进行建构是合理的。《人民日报》以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报道框架不仅有利于形成国内群众的乐观态度，更有利于在国际间树立起新的国家形象，从而建构起新的国家间关系——既然两国现阶段的合作是符合两国利益的，那就仍旧应该选择合作而非担忧。与此同时，我国的宣传策略可以选择针对《纽约时报》的怀疑框架进行释疑。针对不同议题的怀疑找到充分证据进行释疑，以帮助我国在美的身份建构。

其次，通过《纽约时报》的舆论报道侧重点来看，美方对于社会反响的重视程度大于对史实的重视程度。因此，中国在进行自身身份建构宣传时，可以适当减少历史主题通讯的篇幅，加大与社会反响相关文章的篇幅。诸如美国民间对于中国决策的看法、美国民间与中国民间的经贸与文化合作案例等等，都是很好的反应社会现实的实践类议题。这类议题既真实又能有效反哺中国身份建构。

最后，中方要避免在宣传过程中过分强化自身大国形象。虽然中国从经济、人口等多角度来讲都是国际上不可忽略的大国，但是如果由于在新闻宣传上过分强化自身大国形象，让其他国家感受到了竞争与攻击，反而过犹不及，无益于我国亲和友善、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和平大国形象的建立。

三、结论

国际新闻是国家间交往的窗口，也是重塑国家形象、建构国家身份的利器。我们可以从窗口窥探别国的意图与重心，也就能积极运用新闻这一宣传利器有针对性地建构于自身有利、与他人共赢的国家身份。

（责任编辑：陈征）

美国茶党议员移民政策立场的成因分析

陈健怡*

【摘 要】： 自 2009 年以来，风风火火的茶党运动从地方草根发展为国会共和党内部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引人注意的是，以反对大政府和增税为中心主张的茶党，在移民问题上呈现出清晰的反移民立场。本文通过统计第 113 届国会众议院茶党议员提出和联署移民法案的行为，确认并证实了茶党强烈的消极移民立场。茶党议员提出和联署的移民法案内容侧重于边境保护、法律执行和限制移民等方面。而对可能导致茶党消极移民立场成因的回归分析也表明，茶党持不友好的移民立场成因可能是茶党议员所在选区拉美裔人口比重较低，更多来自边境州，茶党议员意识形态更为保守，排外主义、本土主义思想较为浓厚。在美国拉美裔人口比重日趋上升的背景下，白人感到自己的主导地位正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拉美裔的威胁。因而这种焦虑和恐惧的心态导致了茶党对移民的反对和排斥。

【关键词】： 移民改革；美国茶党；拉美裔移民；本土主义

在 2016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公开宣布参加竞选的前三名议员泰德·克鲁兹、马可·卢比奥和兰德·保罗三者均为参议院“茶党连线”（Tea Party Caucus）成员。茶党兴起于 2009 年，其成员反对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主张采取保守的经济政策。在移民问题上，茶党是当前政治力量中最有棱角的一派，研究茶党移民立场的成因对于理解美国政治现状和动态、预测移民改革走向意义深刻。本文借鉴了统计学回归分析的方法，探索分析茶党议员的移民立场成因，这也有助于我们对整个茶党运动性质的认识。

一、茶党议员在移民问题上的政治立场

在移民改革辩论中，茶党议员经常称要在国会提出法案，以解决糟糕的美国移民制度问题。提出法案是议员改变原有政策、推出自己方案的一种有效方式，可视为议员在某个议题上的明确表态。本部分使用内容分析

* 陈健怡，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方法，通过统计第 113 届国会众议院茶党议员提出和联署移民法案的情况来衡量茶党的移民立场。

本文中的“茶党议员”是指第 113 届国会众议院中贴有茶党标签的议员，他们大多加入了“茶党连线”（美国众议院唯一的正式茶党组织），对“茶党运动（Tea Party Movement）”公开表示支持，并在茶党运动的集会上发表演讲。此外，很多议员都在竞选过程中获得过茶党利益集团“自由工作”（FreedomWorks）、“增长俱乐部”(Club for Growth)、“茶党快车”(Tea Party Express)等组织的资助。他们推行保守主义政策，主张小政府、宣扬美国传统价值观和宪政理念。据统计，第 113 届国会众议院茶党议员共有 52 人。[①]

通过美国国会图书馆法案和协议查询系统，笔者搜索并筛选出 113 届国会与移民相关性最高的 84 件法案及修正案。[②]根据内容，这些法案可分为以下七种类型：第一，帮助移民和非法移民，共 21 件（包括帮助被拘留移民实现合法权利，帮助新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等）；第二，促进家庭团结，增加家庭移民机会，共 3 件；第三，加强执法、保护边境，共 22 件，如为州补贴执行移民法经费，增加海关和边境保护警官数量；第四，反对奥巴马，包括反对政府过多的移民救助和 DACA 项目（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暂缓遣返青少年），共 10 件；第五，限制移民，共 6 件，如限制家庭移民，废除出生地公民权；第六，外来工人项目，共 4 件，包括增加新的 H-2C 非移民工作签证；第七，增加科技和投资移民，共 11 件，如为来美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博士提供签证。还有部分法案的主题是打击恐怖主义。

第 113 届国会中民主党议员共 200 人，共和党议员 233 人，除去 52 位茶党议员，非茶党共和党议员约有 179 人。113 届国会的 84 件移民提案和修正案中，共有 411 人次参与其中。根据数据统计，笔者计算出国会众议院民主党议员、非茶党共和党议员和茶党议员在上述七种移民法案的提出与联署者人数占其整体的百分比，分别见表-1、表-2 和表-3。

① 参见附录 1——第 113 届国会众议院茶党议员名单（52 人），名单参考了维基百科“与茶党运动有联系的政治家”页面。

② 参见美国国会图书馆网站议案记录：
http://thomas.loc.gov/home/LegislativeData.php?&n=BSS&c=113
以 113 届国会会期为时间范围，限定查找众议院法案，搜索关键词“immigration”。

表-1 国会众议院不同议员在类型 1、2 移民法案中的参与程度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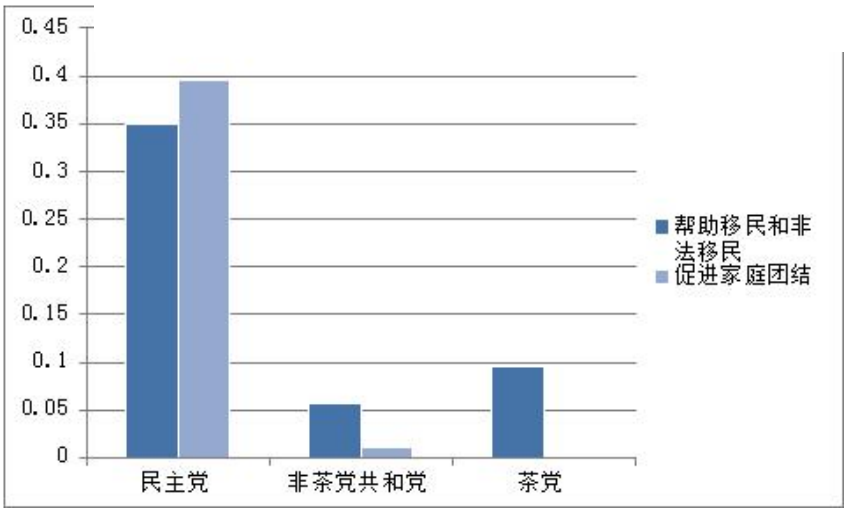


表-2 国会众议院不同议员在类型 3、4、5 移民法案中的参与程度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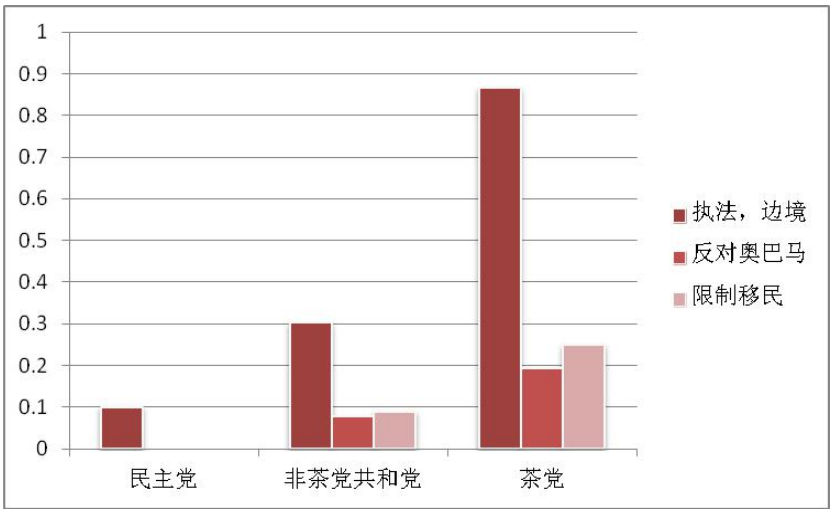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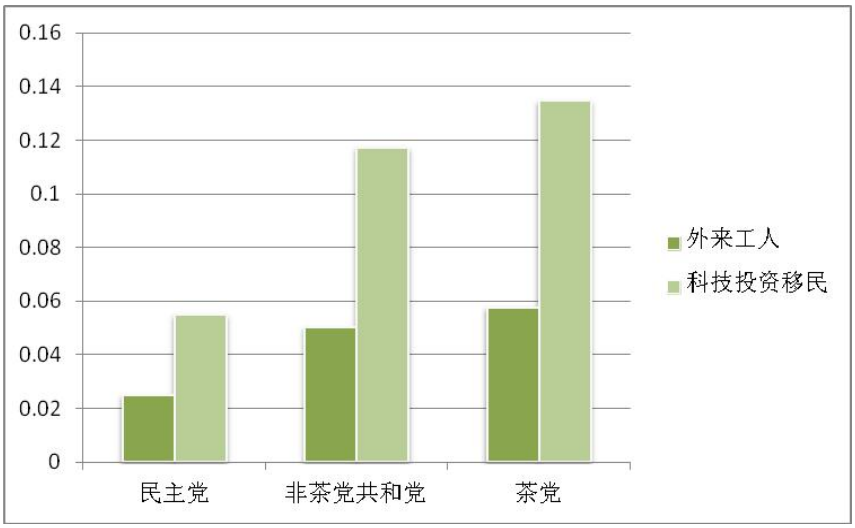


表-3 国会众议院不同议员在类型 6、7 移民法案中的参与程度百分比



茶党共有 85 人次提出和联署了移民法案。活跃的参与度证明了茶党议员比普通共和党议员在移民议题上更为关注和重视。

特别是在加强执法、保护边境，反对奥巴马和限制移民的法案中，茶党的参与程度明显高于非茶党共和党以及民主党。茶党移民政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方面反对民主党“赦免”非法移民的方案。“茶党连线”创立者米歇尔·巴赫曼称，“上一次美国移民法进行全面改革是在 1986 年，国会赦免了约三百万美国非法移民，并承诺未来将加强边境安全。20 年后，我们国家非法移民数量增加了四倍，并且看不到尽头。为了不重蹈覆辙，我认为国会应该保护国家边境，执行现有移民法律。只有完成了这些，我们才能谈下一步的移民改革。我们欢迎合法移民，但是改革不应该给不尊重美国法律的非法移民任何红利。”[①]二是主张加强执法、保护边境，保护美国国土安全。不少茶党议员提出了在美墨修建围墙的方案。巴赫曼在《洛杉矶时报》的采访中说“我们要在美墨边境的每一英里，每一码，每一英尺建造围墙，因为保护不了美墨边境，它就会成为通往美国的高速公路。”[②]三是主张限制移民，减少移民配额。茶党议员史蒂文·金(Stephen King)号召取消出生地公民权利，他认为，“非法移民来美国生孩子，让孩

① Dan Moffett,：“Michele Bachmann on Immigration,”about news, 参见：http://immigration.about.com/od/immigrationlawandpolicy/a/Michele-Bachmann-on-Immigration.htm

② 同上。

子获得美国国籍，然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希望以此合法地让尽可能多的家庭成员通过家庭移民的方式移民到美国，继续容忍这样的行径有损美国的利益。”①

需要解释的一点是，表-1 显示茶党议员在帮助移民和非法移民法案的参与度高于非茶党共和党议员（虽然两者的参与度均远远低于共和党议员）。据统计记录，茶党有 5 人次参与了 3 件帮助非法移民的法案，且这三件法案均是针对 2014 年以来，无人陪伴儿童非法越境行为激增的情况，目的在于促进美国与邻国达成协议，保护儿童不被贩卖，促进非法越境儿童的遣返回国。茶党议员提出《儿童保护法案》（Child Status Protection Act）与其消极强硬的移民立场并不冲突，其目的更多的是保护边境安全和遣返非法入境移民。这和民主党提出譬如在非法移民被拘留期间照顾其小孩的法案动机有明显区别。

二、茶党移民立场成因相关性假设

本部分将从选区需求、意识形态和议员资历三个方面对茶党议员消极移民立场的可能成因作出了假设。

（一）选区需求相关性假设

美国国父们在成立、设计政府构架时，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议员能够代表民众，传达民众的想法和利益需求。而现实中，选区民众的声音的确极大地约束和指导了议员的行为。学者们在大量著作中对于选区对国会议员的影响做出了研究和肯定。这方面的开山之作是尤利乌斯·特纳 1951

① 参见国会议员史蒂文·金个人主页 https://steveking.house.gov/issues/immigration

年的《党和选民：给国会的压力》，瓦伦·米勒和唐纳德·斯托克斯 1963 年的《国会中的选区影响》也颇有影响力。史蒂芬和菲利普·琼斯在《选民对国会投票的反应》一书中指出，国会议员的行动是选民意见的反应，选民有能力让议员在投票时负责。在同性恋婚姻、移民改革等政策上，选民都有着清晰的意见，并能把这种意见传达给议员以使其采纳同样的立场。

“选区需求”即是议员所代表选区的具体情况给议员带来的要求和压力。在以往的研究中，失业率往往是选区发出信号的一项重要指标。《本地内容和国会政治》一文就指出，来自失业率较高选区的议员会受到更多的工会压力，也更容易体谅和同情失业者，因此在投票时偏向于支持保护主义的“本地内容”法案。同样地，在移民问题上，失业率较高的选区，本地白人更容易抱怨移民争夺饭碗。例如：去年奥巴马行政决议刚出台，茶党支持的前参议员里克·桑托勒姆就撰文称：“从 2000 年起，所有净增长的工作都流向了出生在美国之外的工人，……基于供需原理，持续走高的移民增长率导致了低水平的工资，……显然最有可能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如今的大量移民。”[①]因此，我们可以估计茶党议员反对移民的立场是由于选区高失业率带来的压力。

吉姆佩尔在《从共识到争议：美国移民政策的国会政治》一文中指出，存在大量外国移民的选区更欢迎扩大移民的政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大城市的老郊区经历了白人的外迁。[②] 现在美国存在不少大多数人是少数族裔的选区，比如德克萨斯州的第 15 选区，拉美裔人口的比重甚至达到 82.5%。[③] 拉美裔是美国近几年人口上升最快的移民群体，移民改革与其息息相关，而国会移民改革也主要是针对南方边境涌入的拉美移民。因此本部分预测选区拉美裔人口比重与议员移民政策立场有较高的相关度。选区内拉美裔选民比重较高的议员为了获得拉美裔投票群体的支持，

① Rick Santorum:“ Protecting American workers during the immigration debate,” *The Washington Times*, December 2, 2014. 参见：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4/dec/2/protecting-american-workers-during-the-immigration/?page=all

② James G. Gimpel: “ From Consensus to Controversy: The Congressional Politics of U.S. Immigration Poli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urphy Institute conferenc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igration, Tulane University, New Orleans, March 23-24, 2000.

③ 数据参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majority_minority_United_States_congressional_districts

可能对拉美裔态度更友好，满足拉美裔在家庭团结、安全和公平等方面的利益诉求。但是也可能存在着，在白人主导而拉美裔偏多的选区，白人与拉美裔移民在文化和工作等方面的摩擦增多，白人更容易感受到来自移民的威胁，也可能施加压力使议员作出限制移民增长的举动。

布莱恩·基尔瓦斯和欧文·莫里斯在《观茶：理解国会众议院茶党连线成员情况》中发现，茶党议员大都来自富裕的选区。选区贫困率越低，选民对于奥巴马政府的财政支出越为愤怒，因为这些选区不是经济刺激计划和医疗改革项目的主要受益者，反而是埋单者。因此，本文也选取了选区贫困率作为可能影响茶党议员移民立场的因素之一。

最后，吉姆·佩尔的研究还指出，美国两党在移民政策上开始产生分歧起源于对移民带来的经济效益的争论，并与利益分配有关。边境州[①]是移民最常落脚的州，这些州承受的合法和非法移民带来的负担最为严重，因此不太可能支持扩大移民的政策。因此，本文假设来自边境州的议员更容易抱有限制移民的立场。

表-4 第 113 届美国众议院茶党议员选区背景数据

排序	议员姓名	是否来自边境州	拉美裔人口比重百分比	选区贫困率	失业率
1	Robert Aderholt	否	6.2	17.5	9.5
2	Trent Franks	是	18.4	11.1	6.1
3	Tom McClintock	是	12.3	11.1	10.4
4	Ed Royce	是	87.7	29.3	11.6
5	Gary Miller	是	51.6	21.1	12.1
6	Mike Coffman	否	20.4	11.7	7.6
7	Doug Lamborn	否	15	11.2	8.6
8	Gus Bilirakis	是	13	11.6	7.8
9	Ander Crenshaw	是	8.2	12.2	8.1
10	Rich Nugent	是	9.7	16.1	11.8

① 包括加利福利亚州，德克萨斯州，弗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

11	Dennis Ross	是	18.6	14.9	8.6
12	Paul Broun	否	4.91	13.5	9
13	Phil Gingrey	否	12.2	16.2	8
14	Tom Price	否	12.4	15	5.8
15	Lynn Westmoreland	否	5.4	18.7	9.7
16	Steve King	否	6.2	13.4	4.5
17	Tim Huelskamp	否	14.9	15.5	4.9
18	Lynn Jenkins	否	6.2	15.4	6.4
19	Thomas Massie	否	3	14.1	7.5
20	Bill Cassidy	否	4	16.1	6.5
21	John Fleming	否	3.9	21.3	6.9
22	Steve Scalise	否	8.8	13.5	7.2
23	Justin Amash	否	6.7	14.9	8.4
24	Tim Walberg	否	4.1	14.6	8.9
25	Michele Bachmann	否	2.6	8.2	4.4
26	Steven Palazzo	否	3.8	21.1	10.1
27	Vicky Hartzler	否	3.5	19.6	7.3
28	Blaine Luetkemeyer	否	2.4	11.2	7.1
29	Adrian Smith	否	10.8	13.1	4.5
30	Howard Coble	否	6.7	15.1	8
31	Jeff Duncan	否	4.2	19.2	9.4
32	Mick Mulvaney	否	4.1	17.5	9.4
33	Mark Sanford	否	6.4	13.3	7.4
34	Joe Wilson	否	5.3	13.6	9.4

35	Diane Black	否	3.8	16.5	7.8
36	Stephen Fincher	否	2.6	14.4	8.5
37	Phil Roe	否	3.4	19.5	8.2
38	Joe Barton	是	21.1	13.6	7.3
39	Michael Burgess	是	17.5	8	5.3
40	John Carter	是	23.2	10.8	8
41	John Culberson	是	28.3	13	5
42	Blake Farenthold	是	50.6	17.3	5.3
43	Louie Gohmert	是	16.6	19.1	7.3
44	Ralph Hall	是	12.5	16.9	8.3
45	Kenny Marchant	是	23.7	11.1	5.5
46	Randy Neugebauer	是	35.9	17.5	6.5
47	Ted Poe	是	31.3	10.9	5.3
48	Pete Sessions	是	25.6	14.4	7.1
49	Lamar Smith	是	26.9	12.4	5.7
50	Rob Bishop	否	12.2	11.2	5.4
51	David McKinley	否	1.4	17.1	7.2
52	Cynthia Lummis	否	8.9	10.9	5.1

基于上表，笔者对茶党的选区需求情况作出了初步分析。拉美裔人口比重达到 1/3 以上的的茶党议员只有 4 位，占总人数的 7.5%，而有超出一半的议员（27 位）所在选区拉美裔人口比例不到 10%。茶党议员中 2/5 来自边境州，共 20 人。最多的德克萨斯州有 1/3 的众议院议员属于茶党。茶党议员所在选区最高失业率为 12.1%，最低为 4.4%，而有接近一半的议员（23 位）所在选区失业率在 7~9%之间。茶党议员所在选区贫困率最高为 29.3%，最低为 8%，从整体来看，所有茶党议员选区贫困率在 10~20%之间变化浮动，分散分布。

（二）意识形态相关性假设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党派极化现象十分严重，民主党变得越来越自由，而共和党越来越保守，意识形态成为学者公认的预测议员投票行为的最佳指标。瓦莱丽·苏尔法罗在《意识形态对国会投票的影响：国外和国内政策的对比分析》一文中就证实了意识形态能够较为一致地影响议员的投票决策行为模式，无论是国内政策还是国外政策。考乌和鲁宾在《国会投票中的自我利益、意识形态和互相合作》中也发现单独的经济利益不能解释议员的投票行为，意识形态也驱动了议员的行为选择，尽管作者对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有些保留。大量政治学家也认可了考乌等经济学家研究中所指出的意识形态在立法决策中的作用，这其中包括 1974 年伯恩斯坦和安东尼的研究，1981 年伯恩斯坦和霍恩的研究，1985 年弗雷舍的研究和 1987 年克尔曼的研究等。

凯斯·伯尔和霍华德·罗森塔尔在《意识形态和国会》（2007）一书中通过研究从 1789 年国会有记录以来的议员投票历史，发现超过 81%的投票决策可归因于意识形态立场。作者将其划分为非常保守到非常自由等不同的程度，尽管国会的法案议题纷杂，但总是围绕了两个核心话题：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干预以及种族问题。[①]

茶党议员在媒体上总是被称作共和党内部极右派分子，他们比主流共和党人更为保守。在经济议题上，他们反对大政府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反对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医疗支出项目。在种族问题上，有研究表明，茶党已超越主流的保守主义范围，虽声称与种族主义无关，但在其集会场合却屡屡出现涉及种族歧视的标语。2010 年人权与教育研究所就曾发布一项报告，揭示了“白人至上”（White Supremacy）组织对茶党运动的渗透，使得该运动成为“白人至上”组织招募、扩大和宣传的有力载体。[②] 这也导致茶党对于拉美裔移民、同性恋群体等少数人群体的排斥和不友好。本文预测茶党议员在移民改革上如此强硬和消极，可能是因为其极端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对于西班牙语移民对美国英语文化和社会冲击的态度更不乐观和怀疑，更加拥护白人至上主义；而意识形态更

① 参见：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about/Ideology_and_Congress.html?id=eOuZqa7UbqUC
② Matt Barreto et al.: “ Tea Party in the Age of Obama: Mainstream Conservatism or Out-group Anxiety?” in Julian Go, ed. Rethinking Obama(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Vol. 22, 2011.

加自由的共和党议员，能够对移民保持更开放和欢迎的态度。

表-5 第 113 届美国众议院茶党议员意识形态数值[①]

排序	议员姓名	意识形态
1	Robert Aderholt	0.447
2	Trent Franks	0.856
3	Tom McClintock	0.998
4	Ed Royce	0.925
5	Gary Miller	0.608
6	Mike Coffman	0.845
7	Doug Lamborn	0.857
8	Gus Bilirakis	0.623
9	Ander Crenshaw	0.486
10	Rich Nugent	0.778
11	Dennis Ross	0.776
12	Paul Broun	0.984
13	Phil Gingrey	0.847
14	Tom Price	0.931
15	Lynn Westmoreland	0.877
16	Steve King	0.733
17	Tim Huelskamp	1
18	Lynn Jenkins	0.827
19	Thomas Massie	0.999
20	Bill Cassidy	0.747
21	John Fleming	0.818
22	Steve Scalise	0.787
23	Justin Amash	0.999

① 意识形态赋值采取了美国政治科学家凯斯·伯尔和霍华德·罗森塔尔计算的 DW 指数。DW 指数通过考量每一届国会议员在为各项议案投票时的立场倾向来为每位议员的保守度/自由度打分。大约在-1~1 区间内，数值越大越保守。

24	Tim Walberg	0.803
25	Michele Bachmann	0.831
26	Steven Palazzo	0.658
27	Vicky Hartzler	0.725
28	Blaine Luetkemeyer	0.67
29	Adrian Smith	0.706
30	Howard Coble	0.786
31	Jeff Duncan	0.977
32	Mick Mulvaney	1
33	Mark Sanford	0.991
34	Joe Wilson	0.821
35	Diane Black	0.733
36	Stephen Fincher	0.774
37	Phil Roe	0.759
38	Joe Barton	0.706
39	Michael Burgess	1.027
40	John Carter	0.506
41	John Culberson	0.585
42	Blake Farenthold	0.76
43	Louie Gohmert	1.07
44	Ralph Hall	0.712
45	Kenny Marchant	0.937
46	Randy Neugebauer	0.84
47	Ted Poe	0.97
48	Pete Sessions	0.807
49	Lamar Smith	0.602
50	Rob Bishop	0.83
51	David McKinley	0.526
52	Cynthia Lummis	0.948

由图可见，茶党议员意识形态均为正值，除了两名议员外，该群体意识形态赋值均在 0.5 以上，有七名茶党议员意识形态数值接近甚至超过 1，可以说是极端保守。

（三）资历相关性假设

议员更新理论的拥护者施班和劳里认为，“在任议员更懂得风险规避，随着就任时间的增加，对于追求新政策态度更加犹豫；而新的挑战者却更容易选择更极端的立场。”① 蒲岛郁夫等人的研究也指出，“议员要积累必要的工作经验和形成国家立法者观念是需要时间的。因此，当选多次的议员更容易站在这样一种立场上——自己比在国会任职仅仅几年的议员更易着眼于国家全局的利益。前者也对自己的连选连任更有把握，因此他们更敢于促进全体利益而不是只与自己选区相关的特殊利益。”② 约翰·金登在《国会议员的投票决策》一书中指出，年轻的国会议员比资深国会议员更关注选区选民的意见，他们更容易认为选区选民的意见是重要的或者有决定性意义的。其中的原因有两点：资深的议员更容易积累精英人脉资源，威慑年轻的挑战者，他们的胜利很大可能会逐渐累加；资深议员经历过更多争议法案大风大浪的考验，他们更明白有时候民众对自己投票的反对态度会随时间而减弱，不会造成决定性影响。

移民改革已成为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若取得积极进展，将会对美国未来发展产生有利影响。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入老龄化，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注入更多年轻的移民力量，借此摆脱老龄化对劳动力和社会带来的巨大压力，这无疑是一种优势。能够站在美国全局的立场，而不是受限于局部选区利益的议员往往资历更深，他们行事更加谨慎，更能理解妥协对达成决议的效率有重要意义；而级别越低、资历越浅的议员，则可能会利用处于风口浪尖的移民问题吸引眼球、赢得关注。资历浅的议员也更容易不顾党派是否支持，一味迎合选区选民的利益，这正体现在茶党议员和主流共和党人的分歧上。主流共和党人十分看重移民政策立场对于共和党在拉美裔选民心目中的形象，而茶

① Krystyna Zwolinsk,:“ Legislative Voting: Influences on Environmental Voting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es Publica - Journal of Undergraduate Research*, Vol. 13, No. 1, 2008, p.30.

② Ikuo Kabashima and Hideo Sato,:“ Local Content and Congressional Politics: Interest-Group Theory and Foreign-Policy Im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0, No. 3, September, 1986, p.304.

党似乎对此置若罔闻。

表-6 第 113 届美国众议院茶党议员资历

排序	议员姓名	资历
1	Robert Aderholt	10
2	Trent Franks	12
3	Tom McClintock	4
4	Ed Royce	4
5	Gary Miller	3
6	Mike Coffman	4
7	Doug Lamborn	6
8	Gus Bilirakis	2
9	Ander Crenshaw	8
10	Rich Nugent	4
11	Dennis Ross	10
12	Paul Broun	6
13	Phil Gingrey	10
14	Tom Price	10
15	Lynn Westmoreland	22
16	Steve King	10
17	Tim Huelskamp	8
18	Lynn Jenkins	12
19	Thomas Massie	12
20	Bill Cassidy	6
21	John Fleming	12
22	Steve Scalise	8
23	Justin Amash	12
24	Tim Walberg	6
25	Michele Bachmann	14

26	Steven Palazzo	6
27	Vicky Hartzler	18
28	Blaine Luetkemeyer	4
29	Adrian Smith	7
30	Howard Coble	30
31	Jeff Duncan	4
32	Mick Mulvaney	4
33	Mark Sanford	4
34	Joe Wilson	4
35	Diane Black	6
36	Stephen Fincher	6
37	Phil Roe	4
38	Joe Barton	12
39	Michael Burgess	4
40	John Carter	34
41	John Culberson	8
42	Blake Farenthold	30
43	Louie Gohmert	6
44	Ralph Hall	4
45	Kenny Marchant	8
46	Randy Neugebauer	16
47	Ted Poe	28
48	Pete Sessions	14
49	Lamar Smith	4
50	Rob Bishop	12
51	David McKinley	14
52	Cynthia Lummis	18

笔者计算出茶党议员的平均资历为 14 年，但资历在 6 年及以下的议员也达到 23 位。[①]

总的来说，导致 113 届国会众议院茶党议员对移民问题的高参与度和强硬姿态的可能因素包括：1.选区内拉美裔人口比重更高/低；2.选区失业率较高；3.选区贫困率较低；4.议员来自边境州；5.议员意识形态较为保守；6.议员资历较浅。

三、茶党移民立场成因检验

本文的统计样本包括所有 113 届国会众议院议员。52 位茶党议员因变量数值设定为 1，非茶党共和党议员数值设定为 0，民主党议员数值设定为-1。[②] 选区内拉美裔人口比重和失业率、贫困率比重则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 2013 年的美国社区调查。[③] 意识形态和资历两个自变量在前文已有解释。本文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结果见表-7。

表-7 影响第 113 届国会众议院茶党议员移民立场的因素

选区背景	拉美裔人口比重大小	-0.008（-4.19）（0.002）
	失业率高低	-0.067（-4.62）（0.014）
	贫困率高低	0.015（2.27）（0.006）
	是否来自边境州	0.255（3.48）（0.073）
意识形态自由→保守		0.412（12.87）（0.032）
资历深浅		-0.005（-1.65）（0.003）
样本数量=437		
F 值=47.137		P值（F统计量）=0.000

注：每行第一个数值为系数，第一个括号内数值为 t 值，第二个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

① 议员的资历以议员在国会连续就职的年限为准，中间有间歇的情况下，之前的就职年限不计入。
② 完整的各自变量名单、来源和描述性统计量见于附录 2——全部变量信息表。
③ 参见美国人口普查局官方网站：http://www.census.gov/fastfacts/.

由统计结果可知，在 5%的置信水平上，贫困率和资历这两个变量对茶党移民立场没有明显影响，而其他四个变量均对茶党移民态度有明显影响。即：茶党议员所在选区内拉美裔人口比重较小、失业率较低，茶党议员更多来自边境州，意识形态更为保守。

四、茶党移民立场成因的结果分析

（一）选区需求结果分析

结果显示，茶党所在选区失业率较低，与预测相反。说明失业率并不能证明是促成茶党消极移民立场的原因。茶党人士将移民看作美国高失业率的罪魁祸首与现实有所出入，可能这只是茶党政治人物的一种借口和说辞或是一种心理效应，创造了不利于移民的舆论生态。

而拉美裔人口比重这个因素就能有力解释民主党和茶党的移民态度产生巨大分歧的原因。民主党议员代表的选区拉美裔人口比重更高，这就意味着拉美裔选民的比例也更高，拉美裔人口的政治力量可能更为强大，游说团体可能更有势力。民主党议员为了连选连任，必须讨好这部分拉美裔选民，所以在民主党议员提出和联署的法案中，相当一部分法案是关于增加移民机会，尤其是家庭移民机会。友好的移民政策能促进更多的拉美裔移民来到美国，这就增大了民主党议员的政治资本和势力。而茶党议员由于所在选区拉美裔人口比重较小，讨好拉美选民的政治收益较低，所以茶党议员有可能对拉美裔选民的政治诉求持冷淡态度，甚至牺牲其利益。

其次，结果也证实了茶党议员更多地出自边境各州。来自边境州的议员因为现实经历，并且涉及移民方面的工作负担较重，对边境保护、打击跨国犯罪、毒品贩运更为严厉和关注。德克萨斯州第 14 选区前任议员罗恩• 保罗曾在辩论中称美国政府应该“把更少的精力放在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边境，而应把美国军队派遣回国，保护美国边境。”，“把美国所有驻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队派遣回国，美墨边境需要多少军队，政府应尽可能派遣多少。”[①] 边境州不仅承担了执行法律、巡逻边境的大量费用，而且亲眼见证着非法移民穿越边境甚至是毒品走私现象。警员和非法移民者的武力对抗在所难免，不管是亲眼目睹还是收听新闻，边境州的人更容

① Dan Moffett: “Ron Paul on Immigration,” about news, 参见：http://immigration.about.com/od/immigrationlawandpolicy/a/Ron-Paul-On-Immigration.htm.

易认为非法移民是危险的，会威胁国家和公民安全，因此更易对移民抱有消极看法。

茶党议员所在选区拉美裔人口比重较低，以及他们更多出自移民较多的边境州，这两点看似矛盾，却不难理解。在边境州，某些白人较多的选区被拉美移民包围，白人更容易感受到威胁，发出反对的声音。而美国存在的选区重划现象，可能导致针对性地将白人较多的地区划分为一个选区，形成有利于茶党议员上台的情况。

（二）意识形态结果分析

意识形态更为保守也是茶党移民立场消极的重要原因。比较不同变量的统计数据，意识形态对于茶党移民立场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克里斯托弗·帕克在《众议院不通过全面移民改革的（真正）原因》一文中指出，2013 年国会参议院通过的全面移民改革法案 S.744“可以在执行前十年节约 1350 亿美元”，“在未来十年为纳税人节约 6850 亿美元”。[①]然而，尽管该法案获得了包括杰布•布什、约翰•麦卡恩等共和党议员和 200 多位保守经济学家的支持，茶党的反对却使其未能在众议院获得投票机会。克里斯托弗进行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82%的茶党支持者对移民感到焦虑或害怕；而对于限制移民的政策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基于种族歧视，40%的非茶党保守者给出肯定答复，而茶党支持者中给出肯定答复的只有 18%。可能的原因是，茶党支持者对于种族歧视更敏感，不愿承认自己限制移民的立场是基于种族歧视，而是强调法治、经济等其他原因。

如今，拉美裔人口在美国比重已达到总人口的 16%，且增长率明显高于其他群体。茶党议员和支持者们担心美国正被这些与自己说不同语言、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不同的移民占据，自己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而且，茶党人士怀疑拉美裔移民不能融入美国本土文化中，所以当移民改革满足了这些移民的利益诉求时，本土美国人利益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不仅在马萨诸塞州，而且从亚利桑那州到密歇根州的茶党博客中，茶党人普遍表达的一种恐惧是奥巴马总统试图赦免非法移民，以便拉拢一帮潜在的新选民群体。茶党人认为，这些新选民的支持会使奥巴马政府继

① Christopher Parker:“ The (Real) Reason Why the House Won't Pass 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Reform”, Brookings, August 4, 2014. 参见：http://www.brookings.edu/blogs/fixgov/posts/2014/08/04-immigration-tea-party-constituencies-parker

续无视美国本土公民的利益诉求。”[①] 担忧拉美裔移民跟自己“争宠”，这正是茶党反对移民的背后心理。

（三）资历结果分析

结果显示，在 5%的置信水平上，资历并不会明显影响茶党的移民立场。尽管数据显示多数茶党议员的资历较浅，但资历不太可能是导致其持消极移民立场的关键原因。国会众议院著名的“保守双胞胎”——史蒂文·金和路易·戈默特，分别有 12 和 10 年的资历，而 113 届茶党议员中超过 20 年国会工作经历的也有 5 人。这些人不顾自己“德高望重”的形象，在移民问题辩论中毫不相让、而且极端言论频出，与共和党同事们不合作，置共和党形象于不顾。史蒂文·金把非法越境儿童比作“毒品骡子”的冒犯言论曾掀起一场大风波，甚至连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也批评他的言论“非常无礼和错误”。

综合预测分析和检验结果，本文得出结论：选区拉美裔人口比重小、茶党议员意识形态保守和较多议员来自边境州是茶党在移民政策立场上持消极和强硬态度的可能原因。

五、结论

美国的移民改革在过去几年里举步维艰，茶党是其中最强硬的阻力之一。茶党主张在实现有力保障边境安全之前，不能给予非法移民任何赦免机会；美国应投入更多资金更严格地执行现有移民法律。而茶党拥有如此消极和强硬移民立场，则是因为多数茶党议员所在选区拉美裔人口比重较小，呼应拉美裔移民声音的压力更小，他们更多来自边境州；另外一个因素则是意识形态较为保守，本土主义情绪更为浓厚。尽管当前茶党运动已有所平息，但这场在美国掀起一场大风波的社会运动反映了美国白人民粹主义与排外情绪的上升。经济上担心移民跟自己抢饭碗，文化上担心拉美裔对白人文化构成威胁，白人的焦虑和危机感也最终助推了特朗普的上台。在特朗普任内，移民改革必将面临更大的阻力和挑战。

① Vanessa Williamson et al: “ The Tea Party and the Remaking of Republican Conservatism,”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9, No. 1, March 2011, p. 33.

附录 1——第 113 届国会众议院茶党议员名单（52 人）

序号	议员名字	代表选区
1	Robert Aderholt	Alabama's 4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2	Trent Franks	Arizona's 8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3	Tom McClintock	California's 4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4	Ed Royce	California's 40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5	Gary Miller	California's 31st congressional district
6	Mike Coffman	Colorado's 6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7	Doug Lamborn	Colorado's 5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8	Gus Bilirakis	Florida's 12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9	Ander Crenshaw	Florida's 4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10	Rich Nugent	Florida's 11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11	Dennis Ross	Florida's 15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12	Paul Broun	Georgia's 10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13	Phil Gingrey	Georgia's 11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14	Tom Price	Georgia's 6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15	Lynn Westmoreland	Georgia's 3rd congressional district
16	Steve King	Iowa's 4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17	Tim Huelskamp	Kansas's 1st congressional district
18	Lynn Jenkins	Kansas's 2nd congressional district
19	Thomas Massie	Kentucky's 4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20	Bill Cassidy	Louisiana's 6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21	John Fleming	Louisiana's 4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22	Steve Scalise	Louisiana's 1st congressional district
23	Justin Amash	Michigan's 3rd congressional district
24	Tim Walberg	Michigan's 7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25	Michele Bachmann	Minnesota's 6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26	Steven Palazzo	Mississippi's 4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27	Vicky Hartzler	Missouri's 4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28	Blaine Luetkemeyer	Missouri's 3rd congressional district
29	Adrian Smith	Nebraska's 3rd congressional district
30	Howard Coble	North Carolina's 6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31	Jeff Duncan	South Carolina's 3rd congressional district
32	Mick Mulvaney	South Carolina's 5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33	Mark Sanford	South Carolina's 1st congressional district
34	Joe Wilson	South Carolina's 2nd congressional district
35	Diane Black	Tennessee's 6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36	Stephen Fincher	Tennessee's 8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37	Phil Roe	Tennessee's 1st congressional district
38	Joe Barton	Texas's 6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39	Michael Burgess	Texas's 26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40	John Carter	Texas's 31st congressional district
41	John Culberson	Texas's 7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42	Blake Farenthold	Texas's 27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43	Louie Gohmert	Texas's 1st congressional district
44	Ralph Hall	Texas's 4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45	Kenny Marchant	Texas's 24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46	Randy Neugebauer	Texas's 19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47	Ted Poe	Texas's 2nd congressional district
48	Pete Sessions	Texas's 32nd congressional district
49	Lamar Smith	Texas's 21st congressional district
50	Rob Bishop	Utah's 1st congressional district
51	David McKinley	West Virginia's 1st congressional district
52	Cynthia Lummis	Wyoming's At-large congressional district

附录2——全部变量信息表

变量	描述	来源
党派	茶党=1 非茶党共和党=0 民主党=-1	维基百科：与茶党有关的政治家名单 113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名单，国会职员编纂， http://clerk.house.gov/member_info/TTD-113.pdf
拉美裔人口比重	议员所在选区拉美裔人口比重 从0到100	美国人口普查局2013年美国社区调查 http://www.census.gov/fastfacts/
失业率	议员所在选区失业率 从0到100	美国人口普查局2014年美国社区调查 http://www.census.gov/fastfacts/
贫困率	议员所在选区贫困率 从0到100	美国人口普查局2015年美国社区调查 http://www.census.gov/fastfacts/
意识形态	DW指数，大致在1到-1间 数值越大越保守，越小越自由	http://voteview.com/HOUSE_SORT112.HTM
边境州	边境州为1 非边境州为0	美国南部边境州，四个接壤墨西哥，一个濒临古巴和巴哈马群岛
资历	议员在国会众议院连续就职年份	维基百科现任国会众议院议员按资历排序名单， 部分议员资历参见维基百科个人条目

注：附录 1 参考了维基百科“与茶党运动有联系的政治家”页面，并以 113 届为任期筛选得到。

附录 2 来自笔者的整理。

（责任编辑：陈征、夏真真）

政治求索

【编者按】自亚里士多德将政治从伦理学中分离出来，“政治是什么”就成为人类不断思考的命题。亚里士多德说：“政治是追求一种至高的善”，马基雅维利说：“政治无道德”，这看似相反的观点背后是否预示着思想的对立？《政治学》和《君主论》作为政治学发展史上两部划时代的经典著作，今天再来思考，也许会有新的解读和感悟。

《君主论》中权力关系思想的再认识

李括*

【摘　要】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体系基本上包括了国家政体的类型、统治权力的取得与保有、国民军队的构建、权术手段的运用、道德品质的辨析、时代命运的作用等几个方面的主题。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君主论》原著[①]文本的细致研读，本文发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核心是其凭借多年外交实践所构筑的世界观、价值观、知识体系，运用最高级或绝对语气的表述将呼吁具有积极行动能力及意愿的政治领袖凭政治理性构建一种有效的秩序与权力关系的观点隐藏在诸多令人惊叹咋舌或看似离经叛道的经典表达之中。

【关键词】《君主论》；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权力关系；文本分析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通过对基督教道德体系的剔除，从而具有了时代特质下的反传统色彩，因而也为整部《君主论》奠定了基调。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精神特质”的形成是对德意志容克地主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传统主义障碍的反对与克服。在这种意义上，马基雅维利的反传统特质则是政治层面上的，即寻求对十四、十五世纪作为资本主义萌芽地的意大利政治统治四分五裂的超越与挽救。而这一政治观是通过其隐藏在诸多精彩夺目的表述背后的真实意图，即基于人性的必要性权力关系来加以实现的。正如《君主论》第九章最后一句所言，“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考虑一个办法，使他的市民在无论哪一个时期对于国家和他个人都有所需求，他们就会永远对他效忠了。”[②]此处，永远忠诚的基础在于永恒的需求，成为马基雅维利权力关系思想最好的注解。

一、权力关系思想的“人性”基础

马基雅维利对“人性”的分析是深刻的，因而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自私、善变”；他关于君主国家的取得、保有等统治事业的观点与结论更是

* 李括，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6 级博士研究生。

① 本文所提及并参考使用的《君主论》版本均为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2013 年重印版本。

②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 49 页。

悉数出于对人性的考察；另一方面，马基雅维利的“人性观”不应该天然地被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义利观，他本人也并没有后人所认为的那么离经叛道，其许多关于人性的时代考察也是基于古典时期思想家的论述，如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社会性分层的论述：“人有维持生存的欲求，因而目光浅近的人就与那些看得远一些的人携起手来。以上种种形成了人的社会性基础。”进一步而言，“城邦中所见到的是各色各样不能调和的自然欲求，把公民分化开来。也就是说，不可能有和谐、自然的状态就是各个派系互相争斗的状态。”[①]这一思想完整地体现在《君主论》第九章对于市民的共和国里，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派系分化与矛盾的论述中。

马基雅维利式的“人性恶”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重利轻义”的“人性”，第十七章论述君主避免招致憎恨的原则底线是不染指“自己的公民和自己属民的财产”和“他们的妻女”的部分中，马基雅维利指出“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perdita del patrimonio）还来得快些。”[②]第二，是“看重表面、结果和既成事实”的“人性”，第十八章最后的段落中指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③]第三，是“易变”的“人性”，这一点是在第六章便早早提出的，“人民的性情是容易变化的；关于某件事要说服人们是容易的，可是要他们对于说服的意见坚定不移，那就困难了。因此事情必须这样安排：当人们不再信仰的时候，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④] 对于人性“易变”这一点的重要性，应该在理解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公认的马基雅维利强调最甚的观点莫过于君主对于国家军队彻底的控制和保有，这一点正是因为，在新君主国中不存在世袭君主所拥有的依靠传统祖制即可维持统治的便利条件，换言之，新君主国中政治统治的民意基础是不能够保证长久稳定的；因此，对国家暴力的绝对控制在维稳的意义上成为政治核心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

仍然存在争论的是对于马基雅维利“人性观”适当范围的认识。英国学者拉斯基认为，“马基雅维利关于人的某些基本假说是缺乏根据且不恰当的，……人性全然为善或全然为恶是一种过分简化的信念，那些建基其上的理论必然导致扭曲的政治哲学。”[⑤]但是，《君主论》中俯拾皆是的人性恶，能否反证马基雅维利对人性善的全然否认？前文提到，任何人不应该为其没有明确说出的话负责。虽然马基雅维利不断强调人性中的恶性，

① [美] 德·阿尔瓦热兹著，贺志刚译：《马基雅维利的事业——<君主论>疏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72 页。
②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 81 页。
③ 同上，第 86 页。
④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 27 页。
⑤ [英] 哈罗德·拉斯基著，吴灏译：《马基雅维利与当代》，《政治思想史》，2014 年第 4 期，第 109 页。

却并没有明确提到人性中不存在任何善的因素。对前者的强调只能被当做作者的主要观点所在，或是研究兴趣与论述范围所集中之处，而不应、也不能被理解为在马基雅维利的人性思想中后者是不存在的。否则，由此认识所引发的失实观点或偏激行为因由个体自身负责，而不应归咎于马基雅维利的所谓“错误”指引。

二、权术与权力的区分

——博尔贾在何种意义上被马基雅维利视作典范

马基雅维利全部政治思想的实践来源，是其生平所经历过的三十几次作为外交使节的出访见闻。其中又以 1502 年至伊莫拉与瓦伦蒂诺公爵•博尔贾谈判对他的内心震撼最为深刻。在公爵出于友好而允许马基雅维利观察其对政治军事事务的现场处理中，马基雅维利真正有了对与权术手腕与捭阖之术最直观的理解：博尔贾出色地做到了在权力的巩固过程中逐渐摆脱别人的掣肘转而依靠自己的力量与智识，他在必要时可以杀人不眨眼且不避亲疏，并且能够凭借闪电般的行动在想要震慑的对象心里造成有效的恐惧。由此，在《君主论》第七章论述凭借他人取得的新君主国如何保有时，马基雅维利将博尔贾公爵作为优秀的典范推荐给这一类的新君主。但是，公爵在凭借“权术”逐步谋求稳固“权力”的过程中，却突然丧失了其自身真实力量的根本来源，即其身为教皇的父亲——亚历山大六世所给予的支持。因此马基雅维利凭借博尔贾案例想要做到的是重新提倡前章所述——凭借自身力量取得新君主国，尽管某一君主能够做到如博尔贾一般玩弄手段，但他人的助力终究只是无根之木。因此，切萨雷•博尔贾被认作马基雅维利心目中所有新君主的典范并不合适，更不是无原则推崇其邪恶权术，而只是向依靠他人武力的君主推荐其魄力与做法。

另一方面，马基雅维利对于权力与权术区分的论证，在第十一章论教会君主国的部分暗中剑指教会通过对世俗权力的干预与攫取从而由弱变强。法王查理入侵意大利之前，意大利各公国通过在教廷内部制造派系对立，从而弱化教会的力量，因此教皇的世俗权力当时并未被加以重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上台后，利用博尔贾攻城略地，“虽然他的意图本来不是为着壮大教廷的势力，而是为着壮大公爵的势力，但是他这样做，其结果是壮大了教廷的势力。”[①]此外，后继的教皇朱利奥二世克服各种阻碍，先后扫除了威尼斯人和法国人的威胁，并通过限制奥尔西尼和科隆尼斯两派的人担任枢机主教从而根除了教廷内部的派系纷争。这些变化的出现使得

①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 55 页。

世俗国家的真实权力无从有效行使，而不得不寄望于“权术”与外交捭阖的旁门左道以维持统治。此外，法国人对于教会势力在意大利坐大的结果负有相当大的责任。马基雅维利在评价法国国王成功侵占米兰之后援助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占据罗马尼亚一事时指出，“教廷由于宗教权力本身就获得很大的权威，现在法国国王又给他增加了巨大的世俗权力，于是势力大增。”[①]而马基雅维利对法国的这种行事方针自然是嗤之以鼻甚至是充满怨愤的，“教廷和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强大势力是由法国造成的，而法国的崩溃是由它们造成的。”[②]对于法国这个在意大利历史上十分缺乏政治智慧的“损友”而言，马基雅维利在感叹其自作自受之余，更加深入思考的是来自外邦、教会等对意大利统一进程的潜在威胁，这使得他对于一切世俗国家的独立政治主权之外的力量都格外地警惕与排斥。“按照马基雅维利的看法，教会不仅凭借它的世俗权力而成为意大利统一的首要障碍；教会同时也要为意大利在宗教和道德方面的腐化状态承担责任，并且还要为随之而来的意大利政治德行的丧失殆尽承担责任。……也就是说，他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视为次要的第二位原因的那个现象，恰恰就是决定性的原因。”[③]

三、《君主论》篇章结构中权力关系思想的文本梳理

本节根据美国学者德·阿尔瓦热兹（Leo Paul S.de Alvarez）所著《马基雅维利的事业——<君主论>疏证》一书中对《君主论》篇章结构的划分，对该书中的权力关系思想进行爬梳。按照阿尔瓦热兹的方法，《君主论》的篇章结构被分为四大部分：第一章至第十一章为第一部分，探讨君主国的类型；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为第二部分，探讨有关军队的问题；第十五章至第十九章为第三部分，探讨君主的品质；第二十章至第二十六章为第四部分，讨论君主的智谋。通过对四个部分的独立梳理和综合连贯分析，可以发现每个部分的字里行间，马基雅维利通过重复论述，最高级、绝对化语气（如“最好的办法” “最重要

①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 14 页。
② 同上，第 17 页。
③ [美] 列奥·施特劳斯著，申彤译：《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年版，第 270 页。

的事情” “唯一的事业” “头一件事”等[①]）的修辞方法，想要表达的真实观点均为涉及权力关系的某一方面，而这四个方面又彼此联系拼接成马基雅维利关于权力关系思想的有机体系。

首先，在第一部分君主国的类型中，马基雅维利要表达的真实观点是有关君民关系的议题，在第二章中就明确提出并作为思想基础贯穿全书。具体而言，在第二章对世袭君主维持统治具有天然优势的解析中提到：“因为世袭君主得罪人民的原因和必要性都比较少，因此他自然会比较为人们所爱戴。”[②]第三章同样解释了混合君主国的新君主在面临原有国家属民因后悔所引起的反抗时，认为其深层原因就在于“新的君主由于他的军队和新占领之后带来的无数的其他损害，常常不可避免地开罪于新的属民”[③]。在这里，马基雅维利对于世袭君主国与非世袭君主国的区别的考察，就变成了统治者及其统治事业对人民（此处“人民”不含有阶级性意义）及其利益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大还是小的问题。而基于此提出的保有与征服国在习惯、语言、制度方面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最好**和**最有力**的办法之一，也许是征服者亲自前往，驻节在那里。”[④]“另一个**更好**的对策，就是在一两处可以说是那个国家之地派遣殖民……二者**必择其一。**”[⑤]因此，无论是“亲自前往”还是“驻节”或“派遣殖民”，根本目的都是维持君主及其所代表的政权与属地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

第八章的表面内容是众所周知的关于邪恶手段的讨论，包括“妥善使用”的恶行与“恶劣使用”的恶行之间的辩证。而进一步探讨君民关系的部分却往往被忽视。“占领者在夺取一个国家的时候，应该审度自己**必须从事**的一切损害行为，并且要立即毕其功于一役……”[⑥]“因为损害行为应该一下干完，以便人民少受一些损害……”[⑦]。诟病马基雅维利的人只看到上述表述中对恶行的诡诈运用，却对这些行为背后可能存在的“必要性”和对减少人民损害的强调视而不见。而马基雅维利自己则在本章结论部分说道：“总之，君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应该在人民当中生活，以免发生任何意外事件……”[⑧]第九章对市民君主国的讨论中马基雅维利则通过对大众与贵族之间的派系矛盾条分缕析，论证了群众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由于人民的赞助而成为君主的话，他应该同人民保持友好关系。……但是一个人如果同人民对立而依靠贵族的赞助成为君主的话，他

① 下述引文中以加粗体予以提示。
②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 5 页。
③ 同上，第 6 页。
④ 同上，第 8 页。
⑤ 同上，第 9 页。
⑥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 43 页。
⑦ 同上，第 44 页。
⑧ 同上，第 44 页。

头一件应该做的事就是想方设法争取人民。……我只是断言：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友谊，否则他在逆境之中就没有补救办法了。”在这一分析中，无论一个平民市民是凭借何人的助力——大众还是贵族——取得人民的支持都是必不可缺的政治资本。然而，马基雅维利对于人民群众的重视并未停留在对多数力量加以短期利用的群氓政治层面；而是认为“如果把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的是一位君主，而且他能够指挥，是一个勇敢的人，处逆境而不沮丧，不忽视其他的准备，并且以其精神意志与制度措施激励全体人民，这样一个人是**永远不会**被人民背弃的。”[①]“能够指挥”、“勇敢”、“不沮丧”、“不忽视”，且具备“精神意志和制度措施”的统治，无疑是基于君主积极能动性并在制度层面提供有效政治供给的有机联系整体，由此才可以说“永远不会被背弃”，因为君民关系论述到此，在本质上正是民众的持续需求和君主的有效供给相结合所形成的在权力上可持续的相互依存关系。

其次，在第二部分的第十二至十四章中，马基雅维利所讨论的是权力关系中的自主性问题。第十二、十三章通过论述不同种类的军队及其性质后指出，无论是雇佣兵队伍，还是混合军队，只要不是基于一个君主自身的完全控制，就都是不可靠且有害的。虽然各种军队的形式不同，但所造成的结果同样都是壮大自己的敌人而使自身受损：“就雇佣兵而论，其懒散怯懦是最危险的；若就援军而论，其英勇剽悍却是最可怕的。”[②]马基雅维利理所当然地认为，世界上“最强”且“最牢固”的东西，应是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因为“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莫过于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的声誉了。”[③]也由此引出了在第十四章对于君主在军事方面的自主性责任的强调：“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其他的思想，也不应该把其他事情作为自己的专业，因为这是进行统帅的人应有的**惟一的**专业。”马基雅维利通过如此决绝甚至近乎夸张的语气赋予君主建立自有的国民军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与此相反的做法则是极其危险且必须加以禁止的：“不整军经武，就会使得人们鄙视你，这是君主**必须**提防的奇耻大辱之一。”[④]第十九章谈论君主如何避免被人们鄙视与憎恨，而此处已提前给出了部分答案。此外，本章也是全书中使用绝对性语气最频繁的一章，[⑤]马基雅维利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地从正反两面对君主的军事责任予以强调，其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彻底打消当时意大利尤其是佛罗伦萨各君主（或僭主）对于包括雇佣兵、外国军队，

①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 48 页。
②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 65 页。
③ 同上，第 68 页。
④ 同上，第 69 页。
⑤ 类似的表述还有“永远”、“不可能”、“最重要”、“必须遵守”等，限于篇幅，不便一一列举。

甚至教廷神权等在内的不以自己力量为基础措施的依赖幻想。“马基雅维利暗示，诸神依靠的是力量强盛的虚名；他们自己没有力量，要依靠人们对他们力量的信仰和崇拜。”①

这种对君主在军队与军事方面自主性的强调，不仅仅因为前述人性中易变特质所带来的民意基础不稳定的风险，还因为外邦与教廷对国内事务的干涉与对自主权力的蚕食。“事实说明，新兴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只是运用外交上的纵横捭阖而没有自己民族的武力作为后盾，是无法同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抗衡的。”②因此，君主对军事事业的谋求进而在内外权力关系中形成独立的力量，是对国家所有权的根本保障，而对军队保有最重要的基础，则莫过于第一部分中所论述的良好和谐的君民关系的构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民军的建设拥有稳定的兵源。

马克思在评价包括马基雅维利在内的近代政治学家时指出，“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由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③第三部分对君主德性的论述具体回答了马基雅维利是如何做到使“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道德”，从而“独立研究政治”的。

第十五章中马基雅维利列出了 10 组即 20 个相对立的品性，又通过否定的语态动摇了君主盲目为善的根基，指出对于所列举出的良好品行，君主既“**不能全部**”拥有，也“**不能够**完全地保持”；相反，君主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则“**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而“**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④第十六章开始着手在具体论述中破除“慷慨”与“吝啬”在道德层面的褒贬意义。一方面论证二者之间相互转换的逻辑与实例：欲行慷慨就“**不可免地**”豪奢，其代价是耗费物质资财，进而“**必然**”强取于民加重其负担，因此进退两难——进则得贪婪恶名遭憎恨，退则遭轻视，而“憎恨”与“轻视”是为君的根本大忌——“世界上再没有一样东西比慷慨消耗得更厉害的了……一个君主**头一件事**就是，**必须**提防被人轻视和憎恨，而慷慨却会给你带来这两者”⑤；相反的，现实中恰恰是所谓“吝啬”的君主成就伟业而得慷慨伟大之名。另一方面，马基雅维利以自设问答形式对实施所谓“慷慨”这一善行的具体条件加以区分，从而论证“慷慨”与“吝啬”在善恶价值上的相对性，因此，“为善”不应该成为君主治国理政的绝对指导原则，否则善恶之间的转换规律将使君主走向与初衷相反的道路。

---

① [美] 德 1 阿尔瓦热兹著，贺志刚译:《马基雅维利的事业——<君主论>疏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06 页。
②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译者序VII。
③ 同上。
④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 74-75 页。
⑤ 同上，第 78 页。

第十七章的论述使得“残酷”与“仁慈”、“爱戴”与“畏惧”也都成为相对的道德观念，但二者应有各自的底线而不应被滥用。用来作为衡量“残酷”或“仁慈”的标准是否能带来政治上的“秩序”。汉尼拔在军伍之间的“残酷”行为所带来的是纪律与秩序，这对于军队而言是维持其战斗力的根本保障，尽管后世世家对其手段多有诟病，但却没人能够否认汉尼拔在军功上的伟绩；相反，罗马共和国的将领西奇比奥则因滥用“仁慈”、赏罚不明而遭至自己军队的背叛，虽然其自身仍然因为战功显赫而受到当时罗马元老院的庇护，但这种“有害的品性”[①]却没有被马基雅维利所放过。被人“爱戴”或“畏惧”的衡量标准则是“安全”，但是使得运用残酷或使人畏惧自身力量这二者不滑向遭至憎恨的保障措施是残酷手段的使用需要或至少显得有正当的理由，并且不能够剥夺该对象的财产、不可染指其妻女。

在第十九章中，“贪婪”与“霸占臣民的财产及其妻女”被视为避免遭至蔑视与憎恨的两项原则，但是如前述十四章中所提到的“不整军经武”也会遭到人们的轻视，因此应当认为，马基雅维利思想体系中为避免遭到蔑视与憎恨而应该加以禁止的行为实际有三项，即“贪婪”——对“慷慨”的滥用，“霸占臣民的财产和妻女”——对“残酷”的滥用，以及“不整军经武”。此处应当格外留意的是，禁止霸占财产和妻女的指涉对象是具有特殊政治身份的“臣民”，而不是任何人；“臣民”显然是君主自己国家统治下的民众群体，而外邦人或战俘则不包含在这一范围之中。由此可见，马基雅维利对于残酷行为的限制也并不是出于普世的慈善关怀，而是为了确保国内权力关系稳定所作的必要性论述。此外，虽然“不整军经武”、“贪婪”和“霸占臣民的财产和妻女”都会遭至蔑视和憎恨，但是前者所遇到的困境来自硬权力层面，而后两者所遇到的困境是关于君主形象与声誉的软权力层面；前者是基于人性易变的特性，因此在维持政权稳定的意义上要求必须不能弄虚作假，而后两者则是基于人性中看重表面现象和重利轻义的特点，这使得君主可以在投入最少精力成本的前提下在表层政治上维持有效的统治秩序。而实实在在地达到道德高尚的标准，反而会牵扯更多精力使君主不能够更集中地处理真正必要的权力关系。

谈及“必要性”，整个第三部分就是通过辩证的论述方式破除传统道德观念在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必要性，而将从道德观念领域剥夺来的“必要性”重新赋予紧紧围绕权力关系展开的纯粹性政治议题——“秩序”是“必要”的，因此应该作为衡量“慷慨”与“吝啬”的标准，而不是相反；“安全”也是“必要”的，因此应该作为衡量“残酷”与“仁慈”的标准而不是相反。这种政治上的必要性天然地要求君主不为名声所束缚，拥有

①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 82 页。

不惧恶德与恶名的勇气与境界，因为“任何一种善，无论多么优异伟大，都不可能是不加限定条件的绝对的善，而这个说法，就是马基雅维利事实上所采用的说法。”①

最后，在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将道德价值撇除之后，马基雅维利终于能够在第四部分理直气壮地谈论纯粹的政治性议题，并向当时的美第奇家族统治者发出最直接的建议与呼吁了。但在当时还有一个思想观念上的障碍挡在面前，就是对于运道、天命的顾虑。对此，马基雅维利指出：“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②这样就为统治者施展才能留出了至少一半的行动空间，进而在这一部分中呼吁君主适应时代的特性积极作为发挥主观能动。

对于命运的讨论，马基雅维利在第十九章中就已悄无声息地埋下了伏笔：“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位君主都没有一支军队像罗马帝国那样，同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一道根深蒂固。如果说，在罗马帝国时代，满足军人比满足人民更有必要，那么现在所有的君主，除了土耳其皇帝和苏丹之外，满足人民倒是比满足军人更有必要，因为现在人民比军人更有力量了。”③也就是说，除了人民大众自身力量随着时代的演进日渐壮大之外，有一点在当时的意大利是与历史上的罗马所不同的，即意大利不存在君主控制下的国家军队，更谈不上军队同行政当局一样“根深蒂固”。因此，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哪里存在着深刻而稳定的权力关系，哪里就是时代力量之所在，而在当时的意大利，这一力量在民众之间。

在第二十章谈论建造城堡等政治性议题时，马基雅维利自称“赞赏这个方法（指君主建筑堡垒以保卫国家稳固），因为这是自古以来就通用的。然而在我们的时代里，已经看到梅塞尔·尼科洛·维泰利破坏了卡斯特洛市的两个堡垒以便保住那个国家。”④他对于堡垒作为自古以来通用的手段给予了一种平淡的承认，但随后却列举了当时拆毁堡垒的事例并继续分析道：“一位君主如果害怕人民更甚于外国人，他就应当建筑堡垒；如果他害怕外国人更甚于人民，他就应当抛弃堡垒。……所以，你**最好不过**的堡垒就是不要被人民憎恨。”⑤“我称赞建筑堡垒的君主，也称赞不建筑城堡的君主；我非难那种依赖堡垒而认为来自人民的仇恨无足轻重的君主。”⑥如果马基雅维利对前述拆毁堡垒的事例持肯定的态度，那么根据其之前所做的分析，则说明在当时的意大利，君主们是惧怕外国人更甚于人民的，

① [美] 列奥·施特劳斯著，申彤译：《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年版，第 454 页。
②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 118 页。
③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 98 页。
④ 同上，第 104 页。
⑤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 104 页。
⑥ 同上，第 105 页。

这意味着来自外国的威胁甚于国内人民的压力。这样就有力地说明了当下人民大众的力量如今更加强大，也更值得君主争取，意大利君主应该争取并维持对人民的友谊、实现统一，进而共同应对外部世界的政治构想。马基雅维利由此力图说明凭借这样的民众兵源构建起强大而可靠的国民军，实现意大利全境的统一是被赋予了时代条件的。如果说这一事业在历史上是不被允许的，但在如今却是可行的。尽管“意大利过去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均衡状态，在那种日子里，这当然是做得对的，”[①]但是，“这样一种方法表明君主的力量是薄弱的，因为在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国里，绝不允许这样的分裂……”[②]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无论是法国作为盟友的出卖还是来自教廷的鲸吞蚕食，君主们曾经对此加以应对的日常事务，如“解除属民的武装”、“将所属的各个城市分裂”、“树敌反对自己”、“把开始统治时怀疑过的人争取过来”、“兴建堡垒”或是“破坏并摧毁堡垒”[③]等，虽然都是具有必要性的政治议题，但是就权力关系的根本而言，则莫过于顺应时代的特征，营建和谐良好的君民关系、构建独立主权的国民军体系，而与此相比，上述的日常事务则仅仅成为了必要的细节。

（责任编辑：岳叶帆、夏真真）

① 同上，第 101 页。
②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 102 页。
③ 同上，第 100 页。

我与亚里士多德的一次“邂逅”
——从“政治”即追求至高的善到公民个人幸福观的实现

王弘毅*

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有这么一句话，“梦想就是让你感到幸福而坚持的东西”；随后，我的一些好友也有问到我，什么是幸福呢？或许一千个人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然而，在当今市场经济的浸染下，似乎唯财富论、抑或地位论、乃至权力论，已经成为物欲横流之下的主流幸福观，这随之导致人主体性的异化，社会正义观的扭曲。因此，我曾一度陷入沉思而又苦苦未能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这就好比一直以来困扰着人类的三大哲学命题一样，即，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于是带着这个疑惑，我踏上了一段对话古希腊先贤的求索旅程，这也成为我与亚里士多德的一次无法释怀的“邂逅”。

政治善与个人善的一致性

毫无疑问，在大多数人心中，对于政治的理解，几乎都是停留在功利主义政治观的视角里，如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认为，“政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其他大都认为政治是权力斗争的游戏。然而，当我去图书馆借阅亚里士多德全集，读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时候，我恍然大悟。原来政治还有另一种阐释，即政治就是追求一种至高的善。这使我又一次陷入沉思，为什么说政治就是一种善？它明明不是一种统治工具么，当我读到第三卷“善良之人的德性与良好公民的德性”的时候，看到了这么一段话“城邦是若干家庭和种族结合成的保障优良生活的共同体，以完美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为目标，因此政治共同体的确立应以高尚的行为为目标，而不单单只是为了共同的生活，同时政治共同体的目标与公民个人的最高目标具有一致性，即追求至高的善”。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是从国家构成角度来讲，国家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又是城邦中的若干家庭和种族结合而成的，但是城邦中的每一位公民都把追求一种个人幸福的生活作为最高目标，因此这个城邦所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就应该保障其公民实现他们的生活理想，即“善”的实现。同时他认为，人的善就是合乎德性而生成的灵魂的现实活动。人的德性包括两部分，一是理智德性，如智慧、理解、明

* 王弘毅，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6 级硕士研究生。

智等，这是由教导、培养而成。二是伦理道德性，即道德品性。这种道德是由社会风俗习惯熏陶出来的。伦理道德以中道为核心。所谓中道，就是要求人在一切交往活动中，情感生活中，既不要过度，也不要不及，而要保持中间性。过度和中间性都是错误，唯有中道才是德性，才是善。亚里士多德讲的中道，不是绝对中道，而是相对中道，是随人随事、因时因地、以应该的方式来感受。例如，勇敢是恐惧与鲁莽的中道，节制是快乐与痛苦的中道，慷慨是浪费和鄙吝的中道，自重是虚荣和自卑的中道[①]。

公民个人幸福观的探索

幸福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追求，是人类永恒不变的话题。善和幸福是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探讨了什么是善和幸福。认为幸福的生活在于无忧无虑的德性，而德性又在于中庸，那么中庸的生活就是最优良的生活[②]。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下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成为一切道德的基础。从诗歌戏剧到现实生活，人们歌颂真善美，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信念从未改变过。同样在《政治学》中“每种技艺与研究，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在诸多的善中，幸福，是“最高善”，善和幸福，似乎具有某种天然的关系。这两个古希腊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依然如同空中的繁星般吸引着人们去追求、去思考。

属人的善的概念和幸福。既然在全部行为中都存在某种目的，那么这目的就是所谓的善。“其余一切都是为它而活动”，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可实行的善”。如果我们行为的目的是众多的，那么这些目的的综合或者说是最终目的应当是一个，是其中最完满的那个。在亚氏这里，就是所谓的“幸福”。“不论我们选择的是荣誉，是快乐，是理智，还是所有的德性，……我们是为幸福而选择它们，通过它们我们得到幸福。”所以幸福应该是“完满和自足的，它是行为的目的”。因此得到的结论就是最高善即为幸福。属人的善分为三类，依次为外在的善、身体的善和灵魂的善。外在的善包含财富、高贵出身、有爱、好运等；身体的善包含健康、强壮、健美、敏锐等；灵魂的善包含节制、勇敢、公正、明智等。这三者是不可分离的，都是属于最高善的现实活动，其目的都是得到最高的善。当然这些善中，灵魂的善是更加接近最高善的，也因为其自足性。所以“快乐是灵魂的快乐”。在如何获得幸福的问题上，综合起来看，亚氏承认由德性可以习得获得幸福的能力，并肯定了在世的、个人的幸福。并由此引

① 张海仁：“善的求索——亚里士多德德性幸福论浅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33页。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0页。

出了对于德性的探讨。亚氏同时认可了善的获得需要外部条件，这可以从其对外在善的认可看出。我认为，在亚氏看来，幸福的获得，本身是一个从外部善出发，逐渐向上到达最高善，即灵魂善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学习获得幸福的能力，也就是德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①]。

因此，一言以蔽之，公民个人幸福的实现就是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具体的实现途径则源于自身的历练与外界的熏陶，至此，我想不仅回答了什么是善，什么是幸福，也回答了大学教育的内涵与技术专业学校的本质区别了。同时，自身的历练强调一种阅读和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人的主体性思维去思考生活，感悟生活，避免在大机器生产时代成为人性碾压的牺牲品；此外，外在的熏陶是指所受的教育，而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将教育分为以下几类，即读写、体育、音乐等，因为一切功能和技术的个别运用，都是要进行预先的训练和适应，显然德性的运用也是如此。人的本性谋求不仅是能够胜任劳作，而且是能够安然地享有闲暇，正是在辛勤劳作时插入闲暇，作为一剂解除疲劳的良药，它在灵魂中引起的运动才是放松。而音乐教育的设置初衷则恰恰是为了闲暇时的消遣。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以及如何过着一种有德性的幸福生活的不二法门。

（责任编辑：岳叶帆）

① 吴超：“‘善’和‘幸福’的伦理价值——读《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的思考”，《学理论》，2013 年第 15 期，第 43 页。

百花齐放

新疆纪行

赵舒婷*

一 莎车之地

在摇摇晃晃的一列古旧却充满异域风情的绿皮火车里，接近 24 小时的车程，窗外荒滩戈壁交错的景象对我而言已不稀奇。空气中混杂着羊肉的腥臊味，我掰下一块馕，嚼一嚼入肚，也算入乡随俗了。

“生活在新疆的人都知道，馕不能拿起咬着吃哦——”

“——哎哎~咬着吃是畜生吃草的嘛，人是要掰着吃的嘛！”

2015 年 7 月结束在乌鲁木齐一周的培训，我们一行人以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身份出发到南疆莎车县。欢欣混杂着忐忑，吞咽放手的姿势都格外注意，生怕引起一些不尊敬。

目视前方，想象着我的目的地莎车，一个陌生而毫无概念的地方。地图上，莎车已经接近祖国的最西端，与北京有两个小时的时差。百度一下，刚刚输完“莎车”二字就会自动填充那一起极为惨烈的暴恐案件，让“古叶尔羌汗国”、“十二木卡姆之乡”这样人文历史的桂冠也黯然失色。在乌鲁木齐，出租车师傅听说我要去莎车，用憎恨的语气，对，确实是如此强烈的情绪：“你为什么要去那个垃圾地方！”

莎车县号称新疆乃至全国人口最多的县城，辖 32 个乡镇一个街道办一个国有林场，户籍人口 80 余万，加上户籍为造册的约在 100 万，县城人口十余万。按照国家标准，约有 10.28 万户处于贫困线以下，许多乡村被列为扶贫村。

在填写申请援疆表格的那一刻，我从未想过这会是一场怎样的际遇与机遇，对“有政治觉悟”的夸奖只是一笑了之。即使听过诸多关于莎车的

* 赵舒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警告，我都未曾犹疑，相反有一些跃跃欲试。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是在 24 岁去追赶将要逝去的青春，只有当我真正踏上这片土地，像一棵胡杨树站立着，任凭西北的风在耳边呼啸而过，才有勇气承诺自己，在未来要坚定地保持初心，不随波逐流。

在这一年里，我渐渐放下证明自己热血的冲动，而去感受这片土地的温度，从“亚克西木赛孜”（你好）开始我与当地人们的联结。返家之后，醒来仍是艾特莱斯斑驳的色彩和干煸炒面与烤肉的香气。籍由回忆编织一道道故事辫子，也实现我曾经许下的诺言：我希望搭建起一座桥梁，让内地与新疆的人们互相了解，消除隔阂。我希望尽力描述出远在人们视线之外的异域——毕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南疆远比美国日本更为陌生；也希望记录下那些头脑中文化碰撞不停的走笔，作为一手资料为后续更深入的文化探索做一点基础。

二 荒漠的眼睛

记得曾读过古代福建出海人为行船画上眼睛的故事，因为有了眼睛，没有生命的物品便有了灵性，便能保佑船工在风浪无常的大海上好运。

我时常觉得这漫漫荒漠背后，也有一双注视着万物的眼睛。这片与内地大多数省份截然不同的地理空间，如此荒凉广阔，却孕育着自身独特的生命与文明。

这片荒漠不同于“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玉门。出了玉门向西就是哈密星星峡，这道短窄的关口，两边的景色风物尚未变换，却在经年的诗篇累积与边疆消长之下成为一道文化心理上的显著界限。驾

车穿越星星峡到甘肃境内的汉族人对我说：“一过那个口，我心就突然放下了，终于回到自己的地盘了”。文化的碰撞，既交汇为斑斓，也带来隔膜与疏离。

这里也不是李娟《我的阿勒泰》蓝天白云与无际的草原，没有夏花绚烂，冬季凝雪。

这里是南疆无垠沙漠中的一牙绿洲，维吾尔族女作家《隐秘的故乡》曾有过些许片段，而她仍然生长在北疆。戈壁荒滩，偶有一排排白杨树，挤满了人家，连冬季都难以飘雪，两只手就可以数得清一年下雨的次数。

幸而有一座高大巍峨的昆仑山，绵延千里，夏季的融雪水汇聚成叶尔羌河，从这荒滩中淌出一条路。倘若不幸，沙尘席卷侵袭荒滩，河流就无法冲积出沃土，滋养生命。塔里木盆地有许许多多的断流河，楼兰也成为消失的遗迹。

绿洲逐河流而走，时而开阔，时而狭长，甚至河东河西都有不同的光景。“不要说整个新疆，只我们莎车，就有十二种婚礼习俗。”零碎的绿洲，代表着自然的绝对统治与人力的无可奈何。世居于此的，96%以上都是维吾尔族，不同于北疆的人口构成，汉族多是建国后援疆而来的。我能理解此地维吾尔所谓的“懒惰”，十亩薄田，若争不到水，是没有什么好收成的。一个馕可以吃一天，那么就拜一拜安拉，求保佑无遭大难平静地过去吧，为什么要拼命劳作呢？

汉族诗人的诗篇，尽管也深情描摹沙漠胡杨和那低头一笑的维吾尔族美女，但传递的仍是汉族人熟悉的情感，不是十二木卡姆的长诗所表达的缠绵悱恻，他者的视角仍是空白。写下这句话我也有所犹疑，我并无意去挑拨民族区隔对立，本质上我们都是无差别的人类，但却被文化塑造成不同的形态。增添一种视角，究竟是暗藏危机鼓励独立情绪，还是赢得心心相映呢？

一位老新疆对我说：“王蒙在维吾尔人心目中地位老高了，他可以用维吾尔语写作！”这似乎是问题的答案，但我不敢给予任何草率的结论。每写一句，我都不停追问：即使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这难道就是事实与正确的理解吗？

尽管我有野心，但这仍是一份私人记录，放之四海而皆不准。倘若我有幸，迎来你翻开这一页，那么就与我一同思考这些问题吧，即便终究也不得答案。

荒漠的眼睛或许也凝视着我们。

三 小偷与污名

哈密瓜、葡萄、和小偷几乎成为“口里人”（新疆人喜欢把新疆之外的地区叫口里）对新疆的标志性印象。围绕着“新疆小偷”也有层出不穷的段子，例如犯法了警察不抓，杀人了不判死刑。种种故事都指向——这些小偷不但品性恶劣，而且法律无法制裁，令人头疼至极。而且大家所指的“新疆人”，往往指向特定民族。

我自己在武汉和上海都曾遭遇少数民族面孔的小偷，所以我不认为“小偷”的指称是一种彻底的误解与污名。但同样我也不认为，以“小偷”为标签，是合理的污名。

一同去新疆做志愿者的，有一个开朗爱开玩笑的哈萨克小伙子，我俩互相做完自我介绍，他突然说“我还有三个杀人名额没有用”，脸上还挂着狡黠的笑。原来，他来内地上学后，经常被人问起“杀人不判死刑”之类哭笑不得的事情，有时特别无奈，就故意顺着问话人：“对呢，我还有三个杀人名额没用，所以千万不要惹怒我哟~”。类似的标签，确实让许多清清白白的新疆各族老百姓承受不白之冤。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民族地区拨款减少，新疆与内地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拉大。对于南疆农村的农户而言，他们种地所得粮食并不能转变为足够的货币，因而学费显得过于高昂而难以承受。当然，近几年来，国家重新大力投入教育经费，现在的农村孩子读书有充足的保障，但是中间这一小段断层，却给他们带来了难以承受之重。另外，在由一个小城镇熟人社会转型为大都市的陌生化空间的过程中，城市建设速度超过人们的观念与行为现代化的速度。在旧道德约束力消解、新规范确立的过程中，一些人就成为了网格中的疏漏。其实，这与内地许多地区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在南疆的土地上愈加行走，就对新疆的诸多问题越有体会——这既是内地多重问题的缩影，遭遇着社会转型中的种种难题；同时又和民族传统复杂缠绕。一个民族走入现代化不易，而走入另一种文化下的现代化更为不易。在我们看到这些现象时，或许应多一份耐心，多一份理解。

四 “土耳其热”

与一位维族姑娘一起上班，她不由得跟着耳机边哼唱边扭动，“我喜

欢这样热情的音乐，我是坏女人。”说完她娇憨一笑，矜持中带着一点得意，羞涩中带着一分张扬。她听的，是土耳其音乐。

或许就像 80 年代台湾民谣和西方摇滚传入中国的情景一样，大家从原本刻板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发现居然可以这样表达自我——喇叭裤、蓄长发、“离经叛道”，被“资产阶级的精神污染所俘获”。土耳其流行文化，是维吾尔族年轻人从农村走向城市生活借以抒发自我的手段。

“土耳其热”相比当年的“韩流”有过之而无不及。生活在中亚的族群，血统上早已混合，曾经发生的语言突厥化，使得各民族之间不借助翻译，也能听懂对方所言 40%的内容。土耳其（Turkey）以“突厥人之地”自定国名，实际上是晚近的“新发明”。面对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借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包装术，土耳其从故纸堆中找出“突厥”一词，用历史上“从安纳托利亚平原至中国新疆庞大的匈奴帝国”作为其历史荣光而续命的方法（尽管历史上这样建制完整的帝国并不存在，也并不属于土耳其）。但是泛突厥主义一经发明，就试图在中亚的广阔地域生根。某种程度上而言，对于生活在东西交汇之地的新疆，土耳其的文化心理并不遥远。无需翻译，土耳其电视剧通过网络进入天山南北，人们热烈追随土耳其式的优雅生活，从长条饼干到家居用品不一而足。一句话：即使泛突厥主义在政治上是不可碰触的高压线，但土耳其的舶来品代表着高端洋气上档次。

而之所以警惕“土耳其热”，是因为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土耳其政府在支持各种各样的疆独活动。但是对于土耳其文化的流行，可以有更加丰富的解读。

与我们所习惯的近代史叙述——西方列强从海上打开中国大门，西方先进政治思想与科学技术伴随着坚船利炮进入中国——有所区别，对于新疆而言，近代启蒙实际上遵循自西向东的地理转移过程。经由俄罗斯传入的启蒙思想首先落地伊犁，再逐渐散布至新疆各地。西流而来的思潮并非均质扩散，近代新疆各族精英也面对着与口里精英同样的问题，即如何将现代化导入一个传统社会。文化地理空间，历史文化扩散的路径，语言与宗教的亲近关系，决定了维吾尔族在选择现代化元素时，会自然接纳土耳其元素。而以汉族文化为载体的现代化元素，由于历史地理与文化的原因，对于当前南疆与汉族交往较少的地区，客观上也存在陌生之感。

五 生活与宗教

在南疆，切身感受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与其说伊斯兰教是宗教，不如说是一种生活习惯。穆斯林是一种不假思索的文化烙印，或许当地人并不会再仔细追问：作为穆斯林还意味着什么，穆斯林与他者的关系究竟如何。即使每一个人都认可自己是穆斯林，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系统地接受过宗教学习与训练，也不是每一个人从头到尾都仔细阅读过《古兰经》。甚至有些农村地区的阿訇伊玛目，虽会用阿拉伯语发音念古兰经，却不懂得这每一个音节代表什么样的含义。就像一些佛教徒“般若般若蜜”读梵文佛经，却不知道其含义一样。

据有些朋友讲述，去清真寺做礼拜，阿訇大多讲的是“如何做人”、“如何处理与家庭成员的关系”这一类生活伦理问题。如果谁家经济上出了困难，大家本能地会想是不是去找找阿訇。去清真寺做礼拜的人会在阿訇处捐款，阿訇会将这些钱用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还有许多小故事可以说明伊斯兰教在当地老百姓心中有着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即使大家并不熟知伊斯兰教义，但是人们相信它一定是所有美好价值的集中体现。因此，“伊斯兰”，无论如何解释，都是维吾尔族社会重要的组织资源，它提供价值理念、社会资本与号召力。即使目前组织弱化散乱，但巨大的社会动员潜力仍然蕴含其中。

对宗教的理解与实践，实际上也与社会本身生产方式乃至生产方式所制约的社会习惯相关。维吾尔族社会自身也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型，所以在旧的社会结构下对伊斯兰教的理解，是适应不了新的社会需要的。因此对宗教进行重新解释，根据时代需要重新确定“伊斯兰”意义的行为规范迫在眉睫。

六 什么是新疆以及新疆问题

当我得知被分配到喀什地区莎车县做志愿服务的时候，我马上百度这个似乎在历史课本上见过，却毫无概念的地理名词。“莎车县”三个词还未输入完毕，便自动填充“7·28 暴恐案件”。顺着百度百科介绍往下看，“古叶尔羌汗国”、“十二木卡姆的故乡”、“维吾尔族文化核心区”这些词条吸引着一个“天真”好奇的女大学生通过西部计划来到南疆莎车县。我本期待用学理来揭露这片土地，对，是一个到黑屋子的探秘者，想拿放大镜与科学仪器仔细地剖析她，然后逐丝逐条放入可用的理论框里，最后宣布问

题的答案，并宣告我的智识胜利。但现实是，我要诉诸一种极为不客观极为不社会科学的文字，才能描摹这片土地。

一年的南疆生活结束了，如果非要让我勉力说出新疆观感，那就是既震惊于她的开放也震惊于她的闭塞，既感慨她的博大又厌恶她的狭隘，既为这伟大的自然力所折服，又痛恨黄沙满天的单调景致。

作为一个历史上多民族混居，文明东西交汇之地，仅用一种基于血缘、基于特定文化的认同来维系这片疆土是困难且脆弱的。在层层混杂的观念之下，有效治理可能才是这片地域的通行证，才能确保此地的安宁与团结。而在治理疏漏的时期，五光十色的信仰、家族与地方势力填补着这些空白，如同一辆严重破损的老车，勉强摇晃着前行。评价颇高的王恩茂“三个离不开”政策为什么能执行并深入人心，采访时的一个对话或许能够让我们窥见答案。

——“你的爷爷当时为什么会参加解放军？”

——“你是不知道当时共产党威望有多高。”

在他们的记忆中，共产党解放军当时不仅不抢老百姓的东西，如果征用一定给钱，而且给的比市场价还高出那么一点点。这高出的一点点就成为跟着新中国跟着共产党走的理由。

而在今日，阶级话语被新的论说取代，大漠胡杨、昆仑雪山等自然风光逐渐成为新疆的新标签，也是新疆宣传推广自我的主体。大自然不能自己抒发自己的意志，却常常成为代言者。其实用自然作为宣传主体，体现的是对自我发展的不自信，在一个马克思主义信奉者眼中，万里荒漠的自然奇观比不上十里人造林更有说服力。是啊，如果宣传现代化，新疆能拿出比肩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大书特书吗？学习新疆地方史、新疆民族史、新疆宗教史，树立“中华民族是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各族儿女共同缔造的”正确历史观，是新疆解决棘手民族问题的纲领。如果要从历史深处挖掘新疆精神，那么我想值得书写与传颂的便是庇护者的角色。

新疆历史上并未长久地受单一政权统辖，这样的格局客观上构成了新疆的开放姿态。被压迫者，失意者，挥别旧路的人，他们来到这里，寻喘息之机、立足之地。在唐代，一些科举不顺、仕途不彰又渴望实现抱负的青年郎便奔赴西域边关建功立业，这便有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边塞诗。

辛亥革命之后，统揽新疆事务的杨增新虽然无法理解革命时代的新形

势，但是恪守着旧官僚的操行，严令边防官吏不要勒索因俄国十月革命而逃难至新疆的哈萨克族，让受战祸牵连的难民能有喘息之地；也尽最大努力，照顾新疆各族之民生，避免因生计问题引发大量冲突。一个家在阿图什的女孩，自己的外公一家便是在苏联采取少数民族镇压政策之时，从吉尔吉斯斯坦越过口岸，来到新疆找寻一条生路的。

在清末民初的一些知识分子的记载中，陕西山西等地发生灾荒之时，也会有一些灾民涌入新疆讨生活，地广人稀的新疆尚有余力接纳流入的饥民。也有不少为了躲避计划生育或是实在无法在内地分到口粮田的人们，来到新疆开荒，开展自己新的生活。

新疆尽管在近现代历史上并未提出过最响亮最进步的政治口号，但是却实际地庇护着无数为生存而挣扎着的人们。或许新疆历史的意义，还需要更加深入地发掘，才能让我们在今日理解，何为包容，何为团结。

（责任编辑：周婷婷）

花莲小记

姚森元*

今年 2 月初，从华东师大来花莲的东华大学交换一学期，与台北比这儿一定算是乡下了，但空气质量和校园风景可是台湾一等一的好！远游他乡，故地的情丝还没有完全斩断，期盼着这边干净的风景和人情可以洗刷一下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一

清晨，吃过早点，蹬着脚踏车在贯穿学校东西的小马路上消食，雨越下越零星。三人多高的乔木在两侧齐齐地摆开，默视彼此，漫漫长长，随着小马路一直延伸到远处的青山脚下。青山顶着汩汩雨做的云彩，形成一片青灰的天色，虽如此，却一点不觉抑郁，只因凉风爽面，道路整洁，鸟鸣啾啾。拿出手机，放起朴树的“那些花儿”，树木、青山、乌云，鸟儿便不自觉地都和入了旋律里。

“……那些花儿，

……为我开着，

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她身旁，

* 姚森元，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今已离去在人海，

各自奔天涯……”

算了，过去的就让它随风飘散吧，即使是巫山，即使是沧海，也会慢慢逝去，每到新的地方就该结识新的朋友，新的情谊会将空缺填满。

二

虽然花莲是个多雨的城市，但这里的人们却非常的阳光。微笑是最通行的标记，眉头极少攒起。早上扫地的原住民阿姨，路上牵手的情侣，球场上奔跑的印尼小伙，讲台上激情四射的教授，笑容各有不同，可是都有一种纯纯的感觉，像极了这里的空气。初来乍到的迷路，或者有什么小困难，随便拦一个人都会以极大的热情帮助你，特别是一些稍微有点岁数的大叔，更是格外耐心地给予你额外的关怀，如父辈，如长兄，如故乡的邻里。

想知道这里的人儿有多热情，跟我来这家简餐店吧。正对着学校后门，有一家挂着红色招牌——昇旺简餐，小小的门面里提供一些简单的自助餐，荤菜挑一种，素菜选 5 样。我那天是头一次光顾，进门便是招牌式热情满满的“欢迎光临”。老板是一个 50 多岁十分面善的大叔，皮肤稍微有点黝黑，见我第一次来，便一样一样地给我介绍鸡排、猪排、鱼排、素菜……很快，我的口音便暴露了陆生的身份。他跟我聊，说他岳母是四川的，他年轻时也到过大陆云云……他去忙了，我呢，瞅着一大碗碧绿碧绿的紫菜汤（免费的），和堆的满满当当的简餐盒，十分满意，唯有电视里不断重复的鸡毛蒜皮算是点瑕疵。一会儿，老板跑到我面前说：

“来，小兄弟，尝尝这鸡排！”

“我这些够吃！”

“这鸡排是刚做出来的，你尝一尝，不用客气！”老板已经把鸡排拿到了我的面前，真是盛情难却啊，那就豁出肚子啦！鼓着肚皮，我把餐具一样一样放到回收的地方，准备和老板道个别，没想到口音又一次把自己给暴露了。这一次，门口一个正在跟老板谈天的阿姨，也是 50 多岁的样子，长得有些黝黑，一听我的北方口音，就问我是哪里人。结果我们俩都是山东人，而且一个在烟台西边，一个在潍坊东边，紧挨着。阿姨竟然还能用山东方言跟我聊上半天，惹的旁边吃饭的学生都投来关注的目光。阿姨也不着急端她的菜，就大大方方跟我站在门口，骄傲地跟我说她儿子在

重庆买的别墅，开的饭店，说她之前在士林夜市干过很多年，说她请这边十几个陆生一起去她家包饺子，还跟我普及台中的“金钱豹”。我开始一直认真地听她讲，尽享异乡老乡的热情与温暖，因为听有阅历的人吹牛扯淡侃大山是我最喜欢干的事！可阿姨说了许久还不尽兴，眼见着菜要凉透了，我就催着她先找个位子吃饭，她却一直说不要紧，我硬给她把简餐端到一个桌上，她才稍作歇息。临了，我们留了联系方式，她竟开始从包里掏东西，一包智利葡萄干，一包台湾虾仁，一包干果，都要送我。我几乎怔住了，老板在一旁倒是乐呵呵的没有很惊讶，可我哪里收得下，她却说，你不是山东的吗？我们山东人不都这样吗？干嘛这么客气，还当场拆开葡萄干的包装给我尝，让我不收都不行。

为了答谢老板的热情，我下次便邀了好友一起去吃饭，却发现关了门。第二天再去，才知道原来老板前一天刚动了手术。店铺也要盘出去，要换到另一个偏僻点的地方卖面条，不做简餐了，因为太辛苦，面条比简餐做起来容易些。老板虽然术后脖子上的护具还没有摘下，但依然热情款款地来到我的桌前问候菜品好不好吃，要不要添米饭，还邀请我们下个月去新店免费试吃，真是好生感动。

三

在这里虽 2 个月不到，我浓重的北方口音已经成为一张名片，让我结识了不止一位好奇又健谈的大叔。另一个是宿舍门前修车行的原住民大叔，也是 60 岁左右的样子，棕色的长发，皮肤是原住民特有的咖啡色，五官也跟汉族人略有区别。当时我前刹车坏了，拿到他跟前，一眨眼的功夫就修好了，我侥幸地想会不会不收钱呢？但还是要问问多少钱。

“看在你们大陆没有攻打我们的份上，就免了吧！”

“哈哈！那我要是跟你保证，大陆以后永远不会欺负你们，你是不是可以一直给我免单啊？”谁知我们聊民主的话题，竟然还达成了一致意见——在大陆，人们几十年来很适应现行制度，没觉着有什么不自在，政治体制改革要进行，但不能一蹴而就。然后大叔便指着墙上挂着的一个大大的金黄色太阳脸，说那是他自己做的。先用粘土捏出模样，后用牛皮纸作膜包住，外面再蒙一层椰树叶子，便有了均匀的细细的纹路，最后再刷上颜色。整个太阳脸都是用环保材料做成的，火红的舌头直伸到下巴，高高的颧骨像俩小馒头，很有点原住民图腾的意象。

“你看它长得像不像一个人？”大叔问。

“看不出。”“我小时候没有上过绘画课，但很有天分，自己画点什么都还挺像的，那时候很流行画蒋公像，我也画了很多，但问题就来了，我现在不管画什么人像，都感觉像是蒋中正。”

我再一看那原住民特色的太阳脸，还真有三分蒋介石的感觉，不禁大笑，历史的印记真是难以抹杀啊。还想再多聊聊，但又来了要修车子的人，我就与大叔作别了。

四

下面这位大叔，姓陈名伟信，花莲人，天主教徒，东华大学花师教育学院幼教系教授是也。伟信授一堂课，曰哲学与人生，每学期加签无数，教室座无虚席，旦有搬桌携椅来旁听者，余亦忝列其中。其授课每喜以实事入题，问题一抛出，学生争相发言，伟信便将学生观点甲乙丙丁列于黑板之上，形成交锋，再加以引导、串联，逐渐导向当天的主旨。水落石出之时，学生常常暗喜：己之私货竟然与先哲不谋而合！伟信爱开达人显贵玩笑，爱开学生玩笑，爱开自己玩笑，学生常被当场逗得喷饭，捧腹爆笑，七扭八歪。言语之间，幽默之处、博大之处、智慧之处实在不可胜数，此处仅选一例聊做详解。

“今天时间比较紧，我们还差一个重要的论点没有讲，嘿[①]，但讲了那个论点我这个故事就没时间讲了，嘿，我还是先讲一下我的故事，嘿。”

伟信一本正经地讲起自己的往事，语气比讲课还认真。伟信说自己大一刚从偏远的花莲县跑到台北辅仁大学[②]读哲学的时候，班里一个女生请他去家里包饺子。当时他们班就 5 个男生，伟信自忖自己远非最帅的那一个，就挨个儿问其他四个人：“你有没有被邀请？”结果只有他一个人被邀请，“于是花莲十几年的成长环境告诉我，那个女生想跟我结婚!”全班听后大笑，但我听了还觉着蛮合理的。在我们山东，乡下真的可能是这样子。“根据花莲县的习惯，去人家家里做客是一定要带点礼物的，何况这次很可能会碰到岳父岳母。”全班又是一阵大笑。要见这么重要的人，伟信去水果摊挑了最贵重的水果——一个 20 斤的大西瓜，价值他一个月 1/4 的生活费——放在机车前面小心翼翼地前往女生家。结果门一开，里面没有岳父岳母，但是有十几个那女生高中时的同学，一起 party！伟信是唯

① 台湾语气词，是一种停顿，也有自我肯定的意思。

一一个拿了礼物来的，也是唯一一个穿着高中校服（伟信从花莲来的时候不知穿什么，就只带了高中校服）的人（班上再次笑成一片）。伟信感觉落差好大，自己跟别人的区别好大。我听到这儿特别感同身受，因为自己从山东小县城去成都上大学第一次参加 party 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手足无措，格格不入。但更让伟信感觉不舒服甚至愤怒的是，在他临走的时候，有同学跟他说，要平分包饺子的费用。“在我们花莲县，去别人家里做客，吃完东西还交钱？！”我听了也觉着极其的不合理，山东人也绝做不出这种事。还好，这时有一个同学反应过来，“林伟信是有拿礼物来的!”于是，伟信最后收了同学们平分的钱回家，因为那个西瓜太贵了。

欢笑之余，我暗暗惊叹，台湾五六十岁的人跟我这个大陆的年轻人竟有如此相似的心理感受和人生体验。后来，伟信老师还开车请我跟另一个陆生去他一个发小的餐馆吃饭，去参观原住民小学的运动会，去吃蔗冰……问他那个很好吃的“花枝”（类似章鱼丸）多少钱一盘，他很自然地比了一个五，

“这么贵!”

“跟老师出来吃饭不要介意价钱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辅仁大学的时候，神父是大陆人，他也一直请我吃饭，给予很多帮助。所以你们也不要不好意思啦，等你们有能力的时候，也去帮助其他人就好了。”

“一定会的!”

尾声

伟信说，每个人都是一个历史的存在。虽然过去的事可以“算了吧”，记忆里的人可以渐行渐远，但历史的印记会始终相伴。就像简餐店里阿姨那股豪爽的山东味，就像修车行的大叔画像里蒋公的影子，就像花莲环境对伟信的巨大影响……花莲的大叔们教了我太多东西，有一天我也成为大叔的时候，历史应该不会断片。

（责任编辑：周婷婷）

回乡随笔-大陆与我

黄世成*

我凝望流星，想念他乃宇宙的吉普赛
在一个冰冷的围场，我们是同槽栓过马的
我在温暖的地球已有了名姓
而我失去了旧日的旅伴，我很孤独

我想告诉他，昔日小栈房坑上的铜火盆
我们并手烤过也对酒歌过的——
它就是地球的太阳，一切的热源
而为什么挨近时冷，远离时反暖，
我也深深纳闷着

—鄭愁予・鄉音—

有个旅人曾说:还没走出去，看着电视节目以为那就是世界，但那画面是别人所给予的；跟着旅游团踏出去时，犹如到达当地看着当地电视播着旅游节目，也以为那就是世界，但那些是导游安排的路线和场景；当选择自己走出去时，终于成为自己的主角，选了场景选了路线选了地点，你才真正决定那就是你想探访的世界。——这是我选择赴大陆交换的理由之一。去大陆交换，对我而言，就像是一趟探究自我的旅程，透过拜访历史悠久的古迹、寻踏渺渺无烟的人间仙境、穿梭在帝都

* 黄世成，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6 级台湾交流生。

之外的胡同小巷。或者，甚至是手拿一肉串走在街上，看着少数民族在城市里互动、说着我完全听不懂的方言。然后提起笔，将我的交换感想，透过一篇篇的心得分享给在台湾的好友们…….

做为一个读国关的学生，走遍世界，运用所学为毕生之志；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又何尝不想在年少之时，游遍故乡的万里山河，从长辈口中说出来的“根”，不再只是虚无飘渺的回忆。

我何其有幸，在华东师大数月，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学习上，又遇到良师指点。虽偶尔有些讨论，但也从中学到许多为人处世的方法，也让两岸的交流，产生了新的共鸣。

其实，大陆与台湾共同乘载着千年的中华文化与历史，所以当我游走在城市的每一个景点时，很容易对眼前的所见所闻产生共鸣。同一时刻也会感叹自己的地理、历史学习得不够透彻，很多都是来自课本上的一字一句，直到看到景点的介绍才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來到大陆，短短五个月时间，我走了四个省，除了看到自己的能耐也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原来我可以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在人山人海中感受孤独与寂寞，在陌生的城市中才领悟到，最美好的其实还是家，月儿再圆也不及家乡的万分之一。

魔幻上海，做为祖国在东边最闪耀的一颗明珠，我在这里待的时间最久，也渊源颇深，这是我初回祖国怀抱之乡，也是我走向世界之城。在这里，我见证了一线外交专家的深入研究，为社会贡献；各省的人民群众在

这里辛勤工作，为经济贡献。年轻学子在此为未来奋斗，为这个魅力之都，增添一层光辉。

两岸学子互相交流，激荡出许多新思维、新想法。大陆同学勤奋积极、台湾同学创意思考；除了学识，更多的是让对方了解自己，相知相惜。

大陆近几年快速发展，虽然城乡差距大，这样的情况在上海这个大城市尤其可以体现，但这也是每个已发展国家都曾经历过的过程。以发展和成长为背景，与台湾普遍追求的小确幸——也就是微小确实的幸福——不同，大陆同胞有的更多的是对未来的雄心与抱负，不安于现状、想发展鸿图的那份志向，因此整个社会的氛围是充满机会与希望的。

海峡两岸，表层的文化容易理解，涉及价值观的深层文化尚有待弥合。沿着历史的洪流看，两岸同属中国人，外表差异不大，但在经历各种变化以及分歧后，内心是迥异的，因此需要深入接触，去体会与了解。我们应该做的是去浸染在不同的氛围里，体验不同价值观所带来的冲突与冲击，同时坚守住自己的文化和优点，因为我相信这样的做法能激荡出新鲜的体验与更美好的自己，并且值得我们回味一生。

（责任编辑：赵中野）

罗西亚先生其人

辛比耳斯科*

罗西亚先生并不是本名，因其平生最爱的就是罗西亚，所以我在此姑且给他取了这个名。依着先生的性子，若我执意写出他的名字，必得与我怄气几日。罗西亚先生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教书匠，梳着二八分头，身材不高。他长在法租界，在我们眼中当是十分“洋派”的。每在走廊上闻见古龙水的香气，就晓得罗西亚先生今朝来了。平日里他总着二件套西服，袖口、裤脚笔挺，皮鞋擦得锃亮。近来才发现他常穿一件薰衣草浅紫色法式衬衫，领口前襟熨得齐整，袖口别着银色的袖扣。我从没有见过生活中还有人穿这样的颜色，觉得意外地好看。罗西亚先生缓缓道，“侬不晓得，个件衣裳已经差不多有二十个年头了……”

穿休闲装的罗西亚先生是很少见的，只得碰上下雨天，才会套一条浅蓝色直筒牛仔裤、蹬上白球鞋就来上班了。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罗西亚先生的衣服颜色都是很“清新”的。六月里就着各种颜色的 T 恤，大家都说罗西亚先生穿红色 T 恤是蛮好看的，衬得气色好。天冷起来，就在衬衫外头套一件毛衣，有时是棕色格子毛衣配浅鹅黄衬衫，有时是蓝绿格子毛衣搭蜜瓜色或薰衣草淡紫色衬衫。外头再罩一件米色廓形风衣或是细条纹深咖色灯芯绒夹克，风大时就把领头竖起来，日头大时就戴一副最普通的墨镜。我夸他穿得派头足，有腔调，罗西亚先生总会摇摇头摆摆手，道，“侬看侬讲额，我个件风衣穿了有十几年了，已经是老古董了……”

每回去到罗西亚先生的办公室，他总眯眼笑着从里厢走出来，招呼道，今朝又来拉，来做啥事体。接着连忙道，“来来来，吃茶伐，还是吃巧克力。”你只道：“伐要麻烦啦，歇一歇就跑”。没等你话音落，他只管径自跑进办公室，在桌旁的一只草编篮子里翻来拣去，捧出两把糖来给你吃。这只罗西亚风格的草编篮子里厢总能变出什么宝贝来，多数情况下是他最喜欢吃的巧克力。罗西亚先生是三文鱼和甜品的发烧友，他称自己驻外时，电脑旁时常摆一整块新鲜三文鱼，工作一会儿就拿刀削几片下来，就着法式黄芥末和酱油吃几口。遇上甜点的罗西亚先生更是“如疯如魔”，喝热巧克力都要再撒两把细砂糖。罗西亚先生有上海人特别讲究的待客之道，

* 辛比耳斯科，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匿名人士。

身上蕴藏着很多的老派，今日说的清茶一杯待客，对老派上海人来讲是十分不满足的。有客人来，清茶一杯之外，怎么着都要储备些干果点心装一只盆子出来。即使你来送样东西带个口讯，或者仅仅同他打个招呼，他都像对待客人一样，定要你吃些糖果点心才能走。

罗西亚先生爱讲故事，从衡山路的小红楼讲到霞飞路的俄侨商店，从和平饭店的伦斯特列姆爵士乐队聊到兰心大戏院俄国话剧团排演的《樱桃园》，有时讲着讲着，兜兜转转，下课铃就响了。罗西亚先生讲课时，若有上海朋友在场，总不免漏几句上海话出来。现在的人听了都道，那是老派上海话，年轻一辈已不大说“弄怂”“奢瘪”了。他讲普希金时，就从公文包里摸出一个诗人的小胸像，几本罗西亚文版普希金诗集。讲至情深处，恨不得把所有人都带到汾阳路、桃江路口那块三角绿地的普希金像前瞻仰一番，假装在当年的白俄，诵一段《致大海》和《自由颂》，又低头念“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最后还要献上一束米白色的小花。讲柴可夫斯基时，总会从“百宝箱”里掏出不少宝贝：一尊铜制的老柴胸像，一张上世纪从国外淘回来的黑胶唱片，几张十几二十年前的 CD，讲老柴的创作与心灵，讲老柴对罗西亚自然风光的崇拜，讲老柴与契诃夫的惺惺相惜。罗西亚先生总觉得年轻人还缺少那么一点人文情怀，大家被日子匆匆赶着，好像都无心停下来看一看，品一品美好的事物了。在他的公选课上，罗西亚先生都要腾出一堂课安排一台“小型音乐会”，请几位朋友用笛子和大提琴演一演《船歌》和《花之圆舞曲》，用二胡拉一拉《波罗维茨舞曲》和《天鹅湖》。于演奏者来讲，这是再创作；于听众来讲，这是新体验；于课程本身来讲，这是“得其所哉”。总要让朋友们感受一下罗西亚的浪漫曲和歌剧，绘画，建筑，风花雪月，罗西亚人的思维方式，还有罗西亚人面庞的美……

有时他会把自己多年来收藏的相片集子、邮票集子带来，课间总有几个同样爱摄影的旁友围着他，叽叽喳喳问个不停。过去，照相还算得上是个摩登玩意，罗西亚先生自然是个摩登青年，沪上流行什么，他必定会去试一下。罗西亚先生从前爱玩胶片机，自己洗相片，但他老爱玩笑说，那都是“老年人”爱玩的东西，现下年轻人大多不会玩了。他有一大摞相册集子，黑色纸页，每页上只两大张相片，有些相片已经有些泛黄了，但保存得很好。每张相片背后总有一个故事，或是相片中人和物的故事，或是他自己拍照时的花絮故事。好像每一件东西，与他都有话说，知疼知暖的。

他每回给你看相片时，总难掩激动心情，如果没有人以“肚皮饿了，好去吃饭了”为借口，他恐怕回回都要同你讲上整整一天。罗西亚先生说，等到退休了，揣一台老相机，几个胶卷，去拍石库门门楣上的巴洛克浮雕。拍完了，在暗房中的显影液中，罩着红光，看那些纸片如出水芙蓉般浮上来，是再幸福不过的事。

（作者：认得罗西亚先生的人未必见过我）

（责任编辑：赵中野）

“你丑你先睡，我美我直播”：直播现象及其象征的国内主流文化发展趋势

【澳】高林*

近年来，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突飞猛进，在支付、网购、饮食、出行、服务、传讯等诸多领域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以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给人们带来了绵绵不绝且前所未有的生活便利。随着 4G 移动网络的迅速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新颖的互联网应用日益增加，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便利。身为连实现宽带全国全面覆盖都遥不可及的澳大利亚公民，笔者在华体验到的这种创新让我不禁叹为观止，感慨良多。

2014 年微信支付因创新性的春节全民红包互动而名满天下，2015 年滴滴打车让老百姓在生活上再也无法割弃。与此相比，今年蹿红的创新应用却有着云泥之别。在北京国际机场前往市区的路上，我注意到一副巨大的猫头鹰楼体广告牌，上面写道“映客直播”。网络直播早已不足为奇，而当前风靡全国的手机直播平台与电脑直播网站大同小异。据悉，映客平台上有 5000 名所谓的“网红”、10000 名大学生和 10 万名“帅哥美女”当

* 【澳】高林，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6 级硕士留学生，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主播。除此之外，国内目前接近 200 多家直播平台，总共用户量为 2 亿人，而当前的市场估值为 90 亿元。

“直播”的商业原理很简单：观众有需求，主播就有市场。不言而喻，观众们的需求可谓五花八门，包括教课、弹琴、唱歌、和观众互动聊天、甚至直播自己的一举一动，似乎不管什么样的直播频道都有人看，而且，还有的观众愿意花钱去看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平台究竟对社会有什么价值？创新究竟在哪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竟愿意花钱看人家吃饭穿衣睡觉？

茶余饭后的娱乐：有求必应

近期，由于在直播平台上出现的色情、暴力等内容涉及违法行为，遭文化部查处并且惩罚多家直播平台。映客的创始人以及其它相关人士强调，直播平台现阶段还处于初级阶段，潜在用途丰富。笔者在撰写此文时访问了映客的官方网站，发现参考图上的屏幕截图都是很正常的运动类。但是有统计结果显示，查处直播的主要动机及结果还是使人虚度光阴，观众一味围观高颜值的“美女帅哥”送礼物，和主播闲聊。当然，娱乐一下无可厚非，但是这种娱乐活动是极需要适可而止、需要限度的。优酷等网络视频和电视节目从前都提供各种各样的娱乐视频，也是许多网红出道的重要平台，而这种视频多少都包含一些创意内容才能够获得观众的赞同，无论是音乐表演还是幽默综艺。

让人担忧的是，在直播上，积极而富有创意的内容或作品却是寥寥无几，“无聊”的直播内容不可胜数。直播在形式上鼓励观众无聊时打开手机观看主播干一些毫无内涵的东西，譬如化妆、穿衣服、吃饭，既花钱又虚度光阴。随着低俗、消极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世风日下，虚荣和炫耀的空虚现象愈来愈猖獗。难道直播观众的生活是如此无聊，甚至到了连生活都要代理才觉得刺激的份上了吗？

少年得志，可不能无志

媒体低俗化的现象并不限于直播，这种“明星”文化在主流媒体中已经猖獗一时，而直播只是主流明星文化的催化剂罢了。直播与“网红经济”息息相关，有投资者称之为“网红生产神器”，认为直播的潜力在于养活网红。“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说法似乎早就落伍。就算终究要转

瞬即逝，似乎有一大把年轻人为了走红而不择手段。据悉，有大学生在美国为了全职做直播而辍学。

直播在形式上是一种急性反应，舆论环境中大众化的东西越来越庸俗，一旦娱乐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积极工作、学习时，精神和价值观上就会产生物欲横流，甚至道德沦丧的不良趋势。而当前直播的多数内容并非正面，且更无创意可言，称不上“精神粮食“，反而有助于消极言论的传播。类似于“你丑你先睡，我美我直播”这种痛心疾首的话语已经屡次三番在朋友圈刷屏，同时成为了直播的通用宣传语。

美国著名作家安奈·拉佩曾经说道：“每次消费，都在为你理想中的世界投票。”如何判断价值和人才的标准是众口纷纭的主观问题。直播是由消费主义形成的，也是当前社会心态的缩影。当社会毫不顾及原则地鼓吹肤浅的内容，包括颜值、身材和猎奇，实际上抵制的是内涵、品格和创意。这种社会的趋势，恐怕是西方国家常年经历的主流文化愚蠢化的表征。由于主流媒体的低俗化，尤其是鉴于各种真人秀的诞生，澳式英文中管电视机称为“傻瓜匣子”。

直播“前程似锦”？

鉴于目前的市场现状，直播已经被某些业内人士认定为互联网行业的“明日之星”，其投资情况相当可观。可是投资这种产品是否理性，观众的跟风和三分钟热度是否终将转瞬即逝？何为积极创新、何为才华横溢，是个人与社会主观判断而通过消费证实的。近期许多朋友告诉笔者，我所认为“无价值”的美女帅哥直播之所以受观众的喜爱，原因为三：无聊、空虚、解压。据悉，较成功的“颜值高”主播月收入超过 10 万人民币，是上海市月平均工资的十几倍。按照消费主义的基本逻辑，观众认可并且接受直播文化昌盛的“漫无纪律”的社会现象，才会在直播上面消费。对于笔者来讲，这是个不可理喻的异常情况。中国的文艺青年博学多才，我并不认为这个群体不会为一些自命不凡的低俗直播而感到自惭形秽，也不赞同“解压”的说法。中华民族是一个创新能力非凡的民族，持有不辞劳苦精神的积极向上精神，拥有丰富多彩的文艺文化。年轻人的高情远致，不宜受低俗文化的污染，笔者也深信，“上班族”不会认为这种行尸走肉的直播比自己努力不懈的工作有价值。

移风易俗

互联网本身是一种民间艺术、创意和信息传达的交流平台，而当前的乱象是互联网的活力生态和流行文化融合培养出的结果。作为互联网文化的传承方式之一，直播同样具有激发创意的潜力。虽然当前如昙花一现的消极网红在直播平台上熙熙攘攘，同时也有积极人才在平台上传播创意作品。例如，笔者朋友圈中有大学老师创建直播节目，为同学提供创意的上课模式，同时对外开放课程。与上述暴殄天物的“垃圾直播”节目具有霄壤之别，这种积极内容值得社会鼓励和赞扬，在主播提高自我的同时为观众提供焕然一新的内容。但毋庸置疑的是，互联网和真人秀的确为一些人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出道机会。

2016 年被某些人称为名副其实的“直播元年”，但直播是否具有维持性有待观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中齐心合力，坚决抵制文化的低俗化，致力于积极作品和创新。

（责任编辑：赵中野）

科技革新与国际体系的转型

申 韬*

国际体系是国际政治中最基本的概念和分析对象，它是国家间权力结构的客观反映，体现了自然的国际关系生态，其转型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体系内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和成员国国力的此消彼长。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科技进步曾多次加快了国际体系的结构转型，影响了国际体系中的信息、概念与理解，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十分突出。可以说，科技革新已是国家晋身霸权国和维持霸主地位不可或缺的必要能力之一。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欧洲文明的话语权，历经工业革命的加速推动，欧洲文明从生产方式上超越了亚洲文明，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伊尔纽曼·沃勒斯坦在世界体系论中强调了科技优势的重要性，

* 申韬，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4 级博士研究生。

以及发达国家确立和维护科技优势的方式。在中心、半边缘区和边缘区的体系结构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往往是科技领先的国家，而体系扩大的过程往往也伴随着技术的扩张。例如铁路和原子弹通过改变空间和战争威力的方式改变了国家间的互动水平，调整了成员国间的实力对比关系，影响了国际体系的结构，科技对国际体系转型发挥了加速度效应。原子弹之类的科技革新也塑造了一种新的外交与安全观念，它改变了时间与空间上相对距离的感知，从而影响国家的观念与行为。体系结构的调整和观念的改变在新的国际情境下相互作用，产生新一轮的单元体系互动过程，这就是此类科技革新带来的威慑性和平作用。

科技从四个层次对国际体系产生影响：规模、形式、权力和军事实力的功效、地理以及空间的作用。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产业经济膨胀和技术进步导致欧洲国家体系的第二次扩大，第二次殖民浪潮扩大了国家体系的规模与范围，欧洲凭借先进的科技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征服了亚洲和非洲。在国际体系全球化过程中，科技加速了国际关系行为体力量的增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科技革命这样评价:“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对军事工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国家的富国强兵来展现。可以说，科技进步带来的优势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讨价还价的筹码，提高了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在核战争时代，原子弹的研制使得核大国甚至是拥核国超越了常规战争的限制，拥有核武器甚至试图研制核武器的国家在国际谈判和冲突解决中更具优势和影响力，这样一来，科技不仅影响着权力的增长，还改变了国家对安全和地理观念的认识。在互联网信息革新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的年代，科技进步还影响了国际体系内行为体互动的频率、广度和深度。互联网技术使得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得以即时传递，加强了全球公民的认同感，也对各个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方式产生了约束。此外，科技发展使得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科技使这些问题领域不断扩大，使得有关国家间的相关性和依赖性不断加深。

从历史沿革来看，人类文明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伴随着大英帝国的崛起。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体系，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前，欧洲已经基本形成以法、普、英、俄和哈布斯堡为核心的均势格局，但随后的科技革命则极大冲击了既存的多极体系。从历史的经验看来，国际体系

发生变化的动力来源于体系内国家国力的此消彼长以及利益诉求的膨胀，而科技革命导致国力的迅速变化也是科技加速度作用的重要体现。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英国的财富积累在1860年前后达到极致，而美国和德国在第二次科技革命后实现的工业化使得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得到迅速增长和扩张，美德要求修正现有国际体系以获得更大的利益，新兴崛起国和守成霸权国在欧洲和海外殖民地的利益冲突不断扩大化并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崛起充分利用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大战前获得巨大发展，而日本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其利用科技的能力。科技革新与国际体系变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科技从一个外部因素内化成体系变动的内在因素，尖端科技和核心技术在国际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引起一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增长,从而打破原有的力量格局,带动国际格局的变化。所以说，科技革命既是推动各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造成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乃至体系转型的重要因素。在当今信息科技革命时代，国际体系转型开始重视非国家行为体，以往由国家控制的网络安全、新能源材料、人工智能、分子生物等技术大规模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技术的鸿沟正在被填平，科技加入到政治和经济的行列，成为推动国际体系发展的动力之一。而科技扩散带来的非国家行为体权力增加甚至有可能终结国家中心的时代，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更多的“黑天鹅”事件。

（本文为2017年3月15日校园主题日演讲稿整理而成）

（责任编辑：连鹏飞）

国关要闻

我校牵头组建中俄“两河流域”合作智库联盟
首届智库论坛成功举办

3 月 25 日，“两河流域”（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与俄罗斯伏尔加河联邦区）合作智库联盟启动仪式暨首届智库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成功举行。论坛围绕中俄“两河流域”之间的经济、人文合作现状与前景，以及“两河流域”智库合作重点与未来规划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

中俄“两河流域”合作智库联盟首届智库论坛

外交部欧亚司司长桂从友、我校副校长汪荣明、我校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我校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以及来自长江中上游六省市和上海的相关涉俄合作部门负责人，从事俄罗斯问题研究的高校、科研机构代表和企业，及企业联合会代表共 50 余位嘉宾出席论坛，论坛开幕式由冯绍雷教授主持。

我校副校长汪荣明首先代表学校向参加本次论坛的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作为高校智库的一员，华东师范大学始终明确自身肩负着积极服务国家发展重大战略的使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河流域”经济与人文合作，开创了中俄两国战略层面上的非毗邻地区合作新模式。自 2013 年“两河流域”机制建立以来，我校俄罗斯研究中心已开展了多项研究和调研工作。他强调，“两河流域”智库论坛充分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我校邀请 6 省市代表就如何推进“两河流域”合作事项进行共同协商，是共商；共同开展科研学术活动，特别是共同构建常态化的信息交流平台，是共建；合作伙伴间共享信息、材料和研究成果，是共享。他期待与会嘉宾为进一步推进“两河流域”合作积极献计献策。

桂从友司长就“两河流域”机制倡议的提出与建立进行了简要介绍。他指出，“两河流域”合作机制自建立以来，在外交部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与指导下，各省市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继开展了经贸和人文领域的多项合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不少挑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两河流域”之间缺乏相互了解，信息交流不畅，导致双边经贸和人文交流合作过程中频频遇阻。目前当务之急是在“两河流域”合作框架下，高校智库和科研机构发挥自身优势，整合长江中上游六省市的科研力量，为政府部门提供具体对策建议，为各省市对俄合作企业单位提供智力支持。俄罗斯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国家，也是中国产能合作走出去的重点对象。“两河流域”合作，无论是从国家的整体关系、发展需要，还是推动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都具有巨大的潜力。如何挖掘这些潜能，需要智库的大力支持。他建议智库专家的研究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在政治层面，需要更多地总结两地区地方发展经验，开展深入交流；第二，对俄方 14 个联邦主体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进行深入了解，包括地方的法规和经济管理模式，为中国企业家与俄方开展合作提供指导；第三，研究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 6 省市和俄罗斯 14 个联邦主体之间在产业结构和产能等方面的互补性。

开幕式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沈玉良研究员和我校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教授先后作主旨发言。沈玉良研究员重点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在区域贸易网络中的作用。他首先分析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俄在贸易网络中的变化，重点指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的需求及战略合作的必要性，最后他建议“一带

一路”作为中俄战略需要的平台，两国可以在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构建国家科技园提升中俄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强化区域经贸联系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刘军院长从中俄经济外交的角度探讨了“两河流域”的合作。他重点分析了长江中上游与伏尔加河联邦区合作的优势与不利因素。优势包括政治、地理、经济、资源优势，不利因素则体现在地区差距与矛盾、交通与能源基础设施的局限、行业监管与协调机制等方面，特别是俄罗斯 14 个联邦主体内部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社会经济特权的竞争、以及经济利益方面的分歧。在此背景下，他建议中俄非毗邻地区合作有必要构建国家、地方政府与企业三位一体的合作新模式，同时致力于对接服务“一带一路”对接欧亚经济联盟、中部崛起和西部开发、长江经济带等多个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

在接下来的分阶段会议中，来自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湖北省行政学院、安徽省中俄合作交流促进中心、湖南省俄罗斯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重庆国际战略研究院、武汉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南昌大学、华东交通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四川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商会、湖北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湖北省扬子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汉欧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及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俄罗斯投资研究所、上海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上海市侨联青年总会、热士美冷却设备有限公司等 20 余家政府、科研机构、高校、重点企业的 50 余位参会嘉宾代表，分别围绕“两河流域”之间的经济、人文合作现状与前景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专业的研讨。

我校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主持论坛，并进行点评。在闭幕式致辞中，他再次感谢桂司长和各位参会嘉宾莅临“两河流域”合作首届智库论坛并发表真知灼见。他指出本次论坛顺利、成功举行的重要保障离不开各位领导和专家们的参与、指导、支持和帮助，期待在推进“两河流域”合作方面继续得到大家的宝贵支持与帮助，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

“两河流域”合作智库联盟依托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多年来从事俄罗斯综合研究的坚实基础，联合六省市各成员单位，从实地调研、理论探索、战略设计、政策构想等多个层面，为推进“两河流域”合作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联盟的四大核心任务是，为上级部门、六省市政府和企事业

单位提供推进“两河流域”合作的高质量研究报告；共同编写中俄“两河流域”经贸投资指南，对两国企业间开展的经贸合作、投资进行风险评估；构建“两河流域”企业间常态化对话机制，建立“两河流域”商贸信息网和数据库、举办“两河流域”企业家论坛等信息交流平台；共同研究面向“两河流域”合作的专业人才培养，探讨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并推动智库间的人才交流。

政府、科研机构、高校、重点企业的 50 余位嘉宾参会

张严峻、万青松/文
刘金玉、傅裕/图

2017 年“瓦尔代”中俄关系研讨会在莫斯科成功举行

2017 年 4 月 4-5 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与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共同主办的第四届“瓦尔代”中俄关系研讨会在莫斯科成功举行。

来自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商务部、新华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等政府部门、重要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 20 余位中方专家学者，与来自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远东发展部、俄中友好协会、俄罗斯议会联邦委员会、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发展与支持基金会、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经济研究所、能源研究所、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院、莫斯科国立大学、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委员会、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俄罗斯金砖国家研究理事会、俄罗斯政治研究中心、国家能源安全基金会等俄罗斯核心部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 30 余位官员、专家和学者代表，以“中国与俄罗斯：应对全球变化的挑战”为主题，研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应对全球变化的新挑战。会议开幕式由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发展与支持基金会主席安德烈·贝斯特里茨基主持。

贝斯特里茨基在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处于危机之中，过去的一切都已经发生显著性变化。世界体系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重组阶段。在此背景之下，本次会议议程已经远远超出中俄双边关系的范畴，他特别强调了两国专家学者开展对话、探讨当前世界重大热点问题的重要性。

我校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在致辞中首先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铁遭受恐怖袭击表示强烈的谴责，并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他强调，中俄关系，始终是当代国际政治中不可替代的最重要双边关系之

一，对于世界事务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希望本次会议能够给当前中俄关系带来更加务实有效的深入推进。

俄中友好协会主席、俄罗斯议会联邦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委员、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2013-2015 年) 德米特里·梅津采夫在致辞中指出，两国需要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开展更加紧密的协作。他特别强调了上海合作组织在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为国际安全秩序的构建树立了好榜样。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为开幕式发来了视频致辞。她在讲话中深刻剖析了全球变革当中经济全球化面临的诸多问题，分析了导致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复杂原因，并从中国的角度提出了中方的主张与应对举措。同时，她期待俄方积极参加今年 5 月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与中方共商如何实现优势互补和区域新增长。最后，她强调，在世界快速变化的这个时刻，或许人类还不掌握应对全球变局的完整答案，这需要中俄学界和思想界坦诚交流、积极探索，为两国决策层提供前瞻和及时的参考意见，确保中俄两国和两国关系在全球变局的惊涛骇浪当中，站稳脚跟，砥砺前行。

开幕式后，在连续两天的时间里，举行了 6 个阶段会议。

第一阶段会议：中俄面临的总体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与会专家认为，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空前挑战，国际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阶段。在这样的全球变革的推动下，全球变化暴露出的诸多新旧问题已经使世界发展站在历史拐点上，旧的秩序难以维系，未来的出路在何方，成为肩负使命的中俄两个世界大国需要严肃思考和探求的重大课题。与会专

家从国际和国内层面，具体分析了当前的全球不确定性主要表象，指出中俄两个世界大国，需要抓紧协作，提出应对举措，担负国际责任。

第二阶段会议：中俄美三边关系发展前景。大家的共识是面对全球变化的诸多挑战，毫无疑问，三国有必要进行良性互动，甚至开展可能的合作，但是与会专家更为关心的问题是三国需要以什么样的思维和方式去应对和治理。

第三阶段会议：网络安全与网络空间。与会专家指出，虽然网络空间作为一个新兴领域，但当前也面临空前的挑战，需要中俄两国携手应对，包括制定新的规则、签订新的框架协议。专家们建议从联合电子演习、维护网络信息安全、强化政治共识、推动互联网经济、革新全球网络秩序等领域开展可能的合作。

第四阶段会议：中俄共同邻国的动态发展。与会专家指出，有必要对中俄共同邻国局势的变化给予重点关注，包括中俄共同邻国有中亚国家、蒙古和日朝韩东北亚三国。有专家指出，总体上，中亚地区国家当前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以及国家间关系等方面都正处于转换时期，不确定因素增多。鉴于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符合中亚各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各方的共同利益。面对风险和挑战，中俄两国应与共同邻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

在第二天研讨开始前，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斯坦尼斯拉夫·沃斯克列先斯基进行了演讲。他从俄罗斯与亚太国家经贸联系不断增加入手，重点指出了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是迄今为止，两国之间已经成功开展了 17 个重要项目的合作，具有较大的示范作用。最后，他列举

了下一步需要重点开展的三个方面工作，包括中俄合作为亚洲国家提供高质量的商品，满足这些国家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挖掘交通运输潜力，共同在远东打造港口；加强双方在电子商贸领域的合作与协作等。

第五阶段会议：国际能源市场变化及其对中俄的影响。与会专家认为，作为拉动和支撑中俄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的能源合作需要继续巩固。特别是当前全球能源格局出现深度变化，中俄应树立新的合作理念，妥善处理利益关系，加强协调和互动，创新合作模式，扎实推进能源领域的全方位合作。

第六阶段会议：中俄经贸合作现状与前景。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俄双边经贸合作总体上处于弱势，需要不断强化、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当前的优先任务是在具体努力的重点方向上需要找到突破点。俄方专家还指出本国企业在进入或者开拓中国市场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其中大的问题是双方之间的相互了解不够深，需要两国企业界更多的沟通与交流。

阶段会议后，参会的中方代表与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长亚历山大·加卢什卡进行了会见和交流。在讲演和回答中方专家的提问中，加卢什卡既梳理分析了两国区域合作间存在的问题，又介绍了俄方正在采取的一些新举措，比如，构建新的合作机制（远东与东北合作政府间委员会、企业家定期会晤交流机制、设立负责投资的专业部门），设立超前发展区、自由港等。加卢什卡还表态支持中方参与北方航道、远东的开发，邀请中方投资远东运输走廊，并希望与中方共同研究、探讨感兴趣的优先投资方向。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坦诚务实、内容丰富。专家学者们认为，面对当前国际形势激烈、快速变化所呈现出的更多不确定性，需要两国政界、外交界和学界做好应对全球变革的准备，尤其是加强全球变革的思想对话，通过坦诚交流、积极探索进一步碰撞出更加清晰的认识和共识，为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建言献策。

中外读与思　国关院举办双语读书会主题活动

2017 年 4 月 13 日下午，作为学校校园阅读日的主题活动，国关院知行读书会举办了双语阅读主题活动。点评嘉宾潘兴明教授与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鲁静老师共同出席了本次活动，陆依宁同学担任主持人。

双语读书会主题活动

本次读书会活动的特点在于“倾诉历史，聆听历史，进而反思历史，做一名独立自由的朗读者”。七名中国学生用英文，五名留学生用中文，分别朗读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中的精彩段落，并分享自己的体会。

活动分三个部分举行。在第一部分的分享中，周婷婷同学认为，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拐点，从其诞生至覆灭都充满了传奇色彩。作者关于明朝政治结构与士绅阶级的描述十分引人注目。前者与 1928 年之

后的中国党政军三分结构进行了类比，体现了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后者的作用发挥及与政府的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朱信荣同学认为，现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展本质上涉及到一个“中国怎样转变为现代国家的问题”。研究清政府与西方殖民者的关系对于研究这个问题大有裨益，因为这不仅涉及到了中国的国内政治是怎样转变为国际问题的，也涉及到了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

来自俄罗斯的 Anna Khoro- khordina 同学对西方在中国的影响在广州人身上的体现很感兴趣。她认为，可能是由于广州作为最早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广州人成为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碰撞的最早承受者，也成为中国社会最早的改变者。赵中野同学谈到，费正清先生从另一种视角来观察中国历史，即中国社会是一种“应激性社会”，也就是受到了外来冲击并被迫对此作出反应。这样的观点与我们普遍认可的观点并不相同，对此我们应当认识到差异的存在，同时亦要保有自己的理性思考。朱启迅同学认为，晚唐与宋代新儒学的蓬勃发展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它因社会困扰

而生，在稍后的历史时期中占据了主流，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之下又走向了崩溃。然而，是什么促成了它的诞生与发展，它又对社会和平与稳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新儒学与社会的高度融合或许就是其中一个答案。来自美国的 Tim Hughes 同学认为，清政府对新疆的征服，其历史或许很清晰，但其中却隐藏着很多问题，如宗教、外部势力的影响等，其中一些问题还需要继续探讨。

在第二部分的分享中，王弘毅同学认为，明朝的朝贡体系实质上体现的是一种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从效果上来看，确实曾经发挥过作用。岳叶帆同学认为，费正清先生格外关注十九世纪中国政府的腐败、重税问题，这常常为许多人所忽视。现代中国官员腐败的治理问题，应当首先研究中国历史问题，这无疑更具启示意义。来自韩国的朴善姬同学则分析了汉语的影响。袁铭祯同学谈到，费正清先生将中国社会描绘成一个“应激性社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描述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思维模式。来自尼日尔的 Mael Eking 同学认为，黄河哺育了中国最早的农业发展，中华文明无疑也是大河文明。这一点与非洲既有巨大差异，但又有着一定相似性。来自俄罗斯的 Christina 指出，晚清的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凌辱，当时的仁人志士对此做出了无数次强国富民的尝试，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晚清政府的无能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也需要探讨。

在第三部分自由讨论环节中，同学们主要就历史研究能否解决现实问题、朱子学在朝鲜的影响及其变化的原因、一些现实问题的相似性等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的主要译者——潘兴明教授在点评中谈到，本书的重要思想是，作者认为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本来是静止的、固化的，处于自我封闭的运转之中，而 19 世纪以来中国的变革，实质是受到西方冲击下的反应。如果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就不会有变化。这个看法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他认为，同学们的选段摘取基本上反映了著作的整体脉络，对同学们能够结合现实发现问题的能力予以肯定。同时，他希望同学们结合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思考大国在世界和平与稳定中应有的贡献。此外，他结合翻译此书的体会，讲解了翻译过程中容易犯的一些错误，希望借此鼓励同学们通过广泛且深入的阅读，培养更为缜密的逻辑思维，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

潘兴明教授点评

费正清先生在大洋彼岸写下了这本著作。如今，作为国际关系专业的中国学生，以如此截然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不断的追问，赋予了它与时俱进的深刻内涵。

撰稿：周婷婷 陆依宁
摄影：徐亚东 吴景辉
编辑：陆依宁

我院研究生王弘毅团队在“大夏杯”第十四届大学生创业大赛中斩获二等奖

“大夏杯”华东师范大学第十四届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在闵行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A209 圆满落幕，我院 16 级研究生王弘毅团队的项目“研路知己”斩获二等奖。

此次比赛自 2016 年 10 月报名至今，历时近 7 个月，我院王弘毅同学经过激烈的初赛、复赛两个阶段的选拔后，带领其“研路知己”创业团队一路过关斩将，以排名第五的团队成绩进入决赛，并在决赛中以排名第三的团队成绩夺得本次大赛的二等奖。

“研路知己”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和知识变现的理念下研发出来的，致力于整合线上与线下考研市场资源，依托“O2O”模式，为考研学生群体和在校研究生群体提供的方便快捷的“考研知识交互与变现”服务平台。该项目团队成立于 2016 年 10 月，由我院王弘毅同学担任项目负责人，同时吸纳了来自教育学部、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部、设计学院等多学科的学生加入。

撰稿：王弘毅

摄影：校团委科创中心

我院组织留学生考察社会主义新农村

2017 年 5 月 20 日-5 月 21 日，我院组织 2016 级英文硕士项目留学生前往苏州三山岛，考察社会主义新农村。

学生们食宿在三山岛村老支书家中，四层白色小楼朴素干净。在当地居民吴老阿姨的带领下，同学们登高总览小岛全貌，并参观三山岛村史馆，听老支书详细介绍三山岛的历史和发展现状。据介绍，三山岛为一大二小的山岛，一为主岛三山，余名泽山、厥山。全岛面积 2.8 平方公里，村民 286 户，常住人口 806 人。二十年前，三山岛村是个贫困村，经济基础并不是很好，经过持续的开发，三山岛村把生态农业和观光休闲旅游相结合，改善基础设施。近年来门票收入屡创新高，许多当地村民办起了农家乐，接待四方游客。三山岛村成为了苏州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程和创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老支书的讲解，让同学们较为深入地了解到，农业如何与旅游业结合，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同学们还向老支书请教了三山岛的人口构成、持续发展动能等问题。

我院晨晖学者李晓汀老师全程陪同翻译，并深入讲解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历程、目标与愿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模式、问题等。

两天的考察课，帮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状。我院“当代中国研究”全英文硕士项目自2015年开始招生，目前已培养两届学生近40人。学院拟进一步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增加对不同类型区域的考察课，让留学生们直观体验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发展。

撰稿：王玏　　摄影：郑润宇等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马佳士造访我院并发表演讲

2017 年 6 月 7 日，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马佳士（Joshua Eisenman）造访我院，就《习近平－特朗普时代下的中美关系》发表演讲。我院张昕博士、李晓汀博士出席本次报告会，会后马佳士副教授与我院师生就当前当前国际关系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马佳士副教授认为，中美媒体在政治报道中都有部分“失实”的内容，中方的报道偏向正面，而美国则稍显负面，只有将两者结合才能接近中美关系的“真相”。目前，中国正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方在沿线国家进行怎样的贸易合作，也将影响未来的中美关系。

就中美关系的现状而言，马佳士副教授认为，中美双方应当多合作，搁置“信任”难题。此外，中国对美国存在一定的误解，比如中方认为美国在东亚正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联盟，但事实上美国并非如此。美国目前在亚太事务介入不够，正是由于美国没有在东亚扮演足够的领导角色，才导致了东亚目前的安全困境。

此外，马佳士副教授对中美关系进行了预测。从中期来看，中美关系并不明朗。中国正在进行军事改革，以期获得更强的军事实力。此外，中方将怎样和特朗普政府打交道？是加强紧密联系，还是从中画一条线？这都会影响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从长期来看，马佳士副教授教授持悲观态度。目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呈现一些不确定性，亚太局势波谲云诡，中美关系未来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会后，我院师生就朝鲜半岛问题、中美非三边关系问题、中俄边界线问题与马佳士副教授展开了热烈讨论。

撰稿：康恺

摄影：徐亚东

《闻道》征稿启事

华东师范大学《闻道》（季刊）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刊，由华东师大国关院主管，是学生自主管理、自主发行的一份学术思想人文刊物。编辑部成立于2010年12月，2011年3月发行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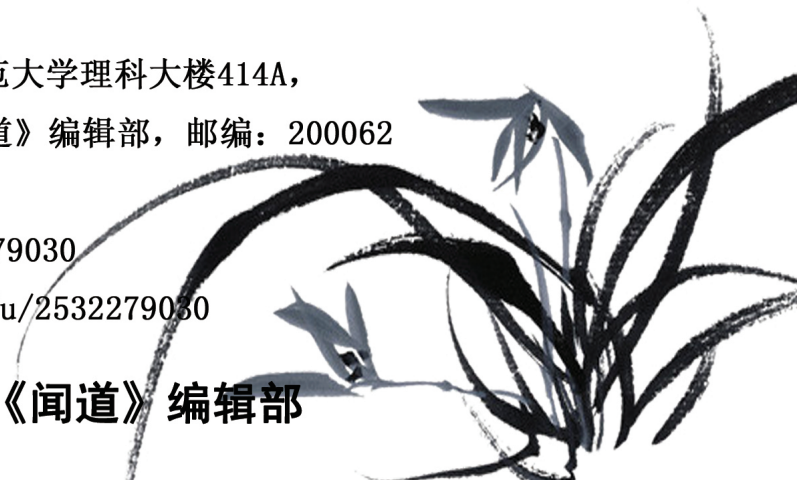
我们坚持“以学术为主，不惟学术，百花齐放”的办刊理念，力图为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面的研究生提供一个学术习练的舞台，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的学人与同学惠赐佳作。

本刊征稿栏目主要有国际问题研究、学术随笔（含书评）以及文艺专栏等。国际问题研究主要刊登国际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来稿字数在10000字左右为宜。学术思想随笔（含书评）主要刊登古今中西经典著作阅读、思想研究等方面的文章，3000-6000字为宜。文艺专栏主要刊登文化艺术类题材随笔，如文学、电影、音乐、戏曲、旅游、时尚等，2000-5000字为宜。

来稿时敬请作者注意：

1. 本刊来稿一律要求原创首发，文责自负，反对剽窃、抄袭等一切学术不端行为。本刊属于内部发行，不影响投稿之后作者转投其他公开性学术刊物。
2. 来稿需为word文档格式，注释采用脚注，可参见《世界经济与政治》注释体例。请作者把稿件电子版以附件形式发至本刊邮箱wendao_ecnu@sina.com。
3. 投稿作者同时需要提供200字以内作者基本信息（姓名、性别、教育背景、单位、通信地址、电话等），以便于后期邮寄期刊和支付稿酬。
4. 本刊对学术论文、学术随笔实行专家匿名评审制度，评审意见会以电子邮件发送给作者。我们会在2个月之内给来稿作者以回复。
5. 在尊重原作的前提下，本刊对决定刊登的稿件可作必要的修改，不同意修改者，请在来稿时注明。
6. 编辑部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wendao_ecnu@sina.com
通讯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414A，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闻道》编辑部，邮编：200062
网 站：http://www.saias.ecnu.edu.cn
博 客：http://blog.sina.com.cn/u/2532279030
新浪微博：闻道杂志社，http://weibo.com/u/2532279030



《闻道》编辑部

S A I A S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